



2011年7月30日8期

总第七十三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文革政治研究】

[胜平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

【史林一叶】

[董国强 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

【争鸣】

[陈楚三 关于清华大学武斗调解的通信](#)

【蓦然回首】

[杜康隆 在文革中当测绘兵](#)

【忆旧思亲】

[王炼利 宁波姑娘甬囡](#)

【简讯】

[卜伟华 两本红卫兵运动的口述回忆出版](#)

[梁志福 《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出版](#)

[华铭 《找寻真实的林彪》出版](#)

【编读往来】

[1、庄菁瑞谈《清华蒯大富》作者自序的局限性](#)

[2、黄葛云谈《清华蒯大富》作者的自序](#)

[3、南阳谈顾土的《科技与文革》](#)

[4、赵正谈王行国日记](#)

[5、翁汇文称赞王行国三文](#)

[6、叶维丽谈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

【文革政治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

胜 平

什么是文革

对不同的人来说，文革有不同的意义。对林彪、“四人帮”之流，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对“黑五类”而言，它是一场生存斗争；对大多数红卫兵，它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而对极少数人，它则是一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事实上，许多相互冲突的团体都曾支持过文革，直到其本身成为文革的目标为止。自己被践踏却又践踏别人，人们在文革中像木材一样相互燃烧。从这一角度看，文革既不像许多中国人今天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由毛泽东和他的仆从设计的大阴谋，也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悲剧表现，更不像李一哲在他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文中所坚持的那样，是一场全民的民主大演习。文革实际上是以上各种说法的总和，它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为不同的目标进行的一系列不同的斗争。

因此，什么是文革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由谁来定义它，以及问题所涉及的具体历史时期。严格地说，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文革，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革。基于这种理论，我完全愿意接受各种关于文革的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对文革的一元化的解释。如果谁坚持说只有他对文革的定义才正确，那么他无疑是错了。如果什么人声称他对文革无所不知，那么，此君非常可能对文革一无所知。

群众专政

在文革的诸多特征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的多义性，亦非它吞噬生命的能量，而是它迫害无辜的独特方式。在文革中，政治迫害成了一种精巧的艺术。随着群众专政代替国家警察，“老大哥”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是忠实的公民，只要他还想活下去，就必须成为政府的鹰犬。这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邻居斗争邻居，朋友出卖朋友，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检举父母。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曾经如此沦丧，人类的尊严从未遭到如此的践踏。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从未如此自豪过，他们从未像在文革中那样确信，人间天堂已在中国实现。

借用一下奥斯卡·瓦尔德的比喻：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三种暴君，他们分别对人的肉体、灵魂以及灵肉两者进行统治。第一个暴君的名字叫“君主”，第二个是“教皇”，第三个则被称为“人民”。三者之中，最后一个暴君最为残酷，也最不可抗拒。君主的暴君可以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教皇的权威，取决于人们对他的信仰程度；人民暴君则从定义来说就是不可战胜的，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暴政，只有随着人民本身的毁灭而毁灭。

文革的群众专政，无疑是第三种暴政在历史上的最高表现。的确，只是在中国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工人、军人和农民——都被运动耗竭之后，文革的暴政才终止。作为人民权利真实和终极的表现，文革并非与毛泽东的生命一起结束，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它就失去了动力。如果说，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代表文革的顶峰，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是它的谷底。其间的转折点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它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无形的手

回顾文革，人们看不见真正的胜利者。所有它的参加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红卫兵还是走资派，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刽子手还是它的“牺牲品”，最终都被抛入地狱。没有人——即使毛泽东也不例外——从文革中获益，所有人

都失败了。这场革命正如他的刽子手及牺牲品之一的林彪所说，是一台“绞肉机”。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为什么文革变成了全民的一场噩梦？在纷繁的表面现象之后，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玩弄一切人的命运。要找到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不仅要研究文革的动乱年代，更要研究中国的历史。

本文试图证明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这只无形的手隐藏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中。中国的政治文化，又称国粹，是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它对文革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了解文革的关键。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人从这种角度来研究文革，而把文革看为一场反传统、反文化的革命。人们忽视了它与中国的历史之间的联系。

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我所用的基本工具是中国政治文化。这里所谓政治文化，指的是一整套为人们广泛接受并指导其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及道德准则。换言之，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特定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实质上决定了正义、法律及其道德的准则。

历史的追述

以政治文化为镜，我发现文革并非绝无仅有，它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旧式的中国农民经常与皇帝站在一起反对腐败的官僚，文革中的造反派与毛泽东结成联盟反对中国的新贵。封建时代的臣民宁愿奴役下的平等，也不接受自由中的不平等。文革时期的公民亦是一样。例如，安慰一个被冤屈的教授最好的方式不是为他恢复名誉，而是把他的同僚也同样冤屈。既然人们不能同样强大，他们宁愿同样软弱，既然他们不能同富，他们就宁愿均贫。“36元万岁！”这一上海文革时期流行的口号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在许多方面，文革与太平天国运动相似。太平天国的追随者摈弃孔夫子，接受西方基督教，文革的信徒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传统观念。太平天国提倡土地共产和男女平等，禁止纳妾、裹足、包办婚姻、吸毒及赌博，毛泽东主义者也在文革中推行了一整套与之相似的社会改革方案，比太平军有过之无不及。一旦大权在握，太平军立即分裂，互相残杀，红卫兵也不例外。最后无论是太平

天国的追随者还是文革的参与者都保留甚至完善化了它们自诩所推翻的旧制度的某些特征：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尔虞我诈、人治及其政治迫害。

在 1966-1967 年的红卫兵运动中，人们也可以看到 1900-1901 年的义和团运动的影子。义和团活动中心是北京，并受到慈禧的支持。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毛泽东是他们的最高统帅。正如义和团依赖符咒、神拳一样，红卫兵依赖毛的小红书和“精神原子弹”。义和团围攻外国领事馆，红卫兵焚烧了英国代办处。无知而又轻信，义和团和红卫兵都在被当权者利用后遭到抛弃。在为历史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他们都被后人描绘为流氓、恶棍，或魔鬼。不再有人知道他们真实的动机和身份，也没有人记得他们真正的怨愤和悲哀。这就是他们最为相似的终极命运。

文革在劫难逃

“革命不是制造的，它们来临。”文革也不例外。文革并非从天而降，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不仅毛泽东，他的亿万追随者的心灵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发动一场如此规模的革命。罪恶之源——如果我们可以称文革是一场罪恶——在人们心中。毛泽东给了文革第一推动，人们使它真正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的劫数。

许多西方人相信，一切人都渴望自由，专制的唯一基础是强制。这种看法并不对。事实上，正如亚当·麦克尼先生指出：“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制能力。”在这种专制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为数极少，而就在这少数人当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对暴政并非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这条规律完全适用于文革初期从中国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在中国不过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少数人掌握时，它被用来迫害多数人；在多数人手中时，它被用来反对一切人。文革的一个

教训是：旧制度仅允许少数人滥用权力，新制度——群众专政——则允许多数人作恶。

政治迫害对其被迫害者的心灵摧毁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在长期的压迫下，人的心灵会为仇恨及报复意念所蒙蔽。一旦权力到手，奴隶不仅会迫害他们的主人，也会对自己的兄弟施虐。正如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长期被人践踏的人，本能地想要践踏别人。对于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最好的学校。”鉴于中国在文革前曾有过那么多人遭受迫害，人们对文革中出现如此大量的迫害者的现象应该完全可以理解。

据官方统计，文革使一千万人死亡，一亿人受到迫害。然而 90%以上在文革中犯下各种罪行——谋杀、刑讯及抢劫——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原因并不是还没有找到他们，而是这种人实在为数太多，法不责众。大多数文革牺牲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多数的迫害者也是他们，两者时常互换位置，且都有参与迫害的难言之隐。“如果极权政治仅是一小撮暴君对一个无辜民族的压迫，推翻它就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西蒙·李写道：“事实上，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

结论

文革的结束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所谓未来的信念。过去被摧毁，而未来又失去，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地狱的边缘，它既不属于孔夫子，也不再忠于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愿意宽恕的幸存者已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

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什么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做。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甚至不担心灵魂下地狱。

文革摧毁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精神真空。但是，政治迫害并没有结束。一些人相信，文革式的普遍迫害会使人产生一种政治智慧，从而为在中国永远结束政治迫害创造了最佳条件。事实恰好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会使结束暴政更加困难。因为归根结底，极权制度的力量并非在于它抗拒变化的能力，而在于它改革那些试图改革他的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中国长期政治迫害的使命，也许只能由一代新人来完成，这些人不是文革的幸存者，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未受过迫害。

摘自作者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中文版。

【史林一叶】

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

董国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卷入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造成的社会危害大，成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之一。对于文革期间民众政治参与的动力、性质和作用，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与论述。由此发轫的“社会冲突理论”统治西方学界长达30年，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那种理论解释框架，人们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人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网络关系。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冲突是冲突各方文革前的现实处境的一种反映。一部分人由于是现存体制的受益者，因而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现存体制；另一部分人由于被现存体制边缘化，因而总是希望通过改变现状争取更多的权益。因此文革运动一来，这些人便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质言之，促使人们“造反”的根本动因，是文革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

笔者并不全盘否认“社会冲突理论”的解释。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不

难发现这种解释体系有其适用的限度。简单地说，这种解释框架发生效用的前提，是现存体制的稳定性和运动走势的内在延续性。但文革并不是一场有规则的政治运动。来自中央的含糊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导向，以及地方各种政治势力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对这些政策导向的不同诠释，从一开始就造成群众认知的极大混乱。此后毛泽东的许多出人意料的决定，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因而，群众运动的起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解释体系加以涵盖。其次，运动参与者的派性认同是在不断变化的运动走向与错综复杂的相互碰撞中形成并不断地变化的。

本文以南京地区几个重点单位为基本对象，考察群众运动在 1966 年夏天至 1967 年春天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本文选择南京大学，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和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首先是因为这三个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一。1966 年 5 月“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它被江苏省委确定为当地文化革命试点单位。6 月初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被中央媒体公布以后，南大随即发生“六二事件”，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这个事件标志着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起点。此后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南大学生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红卫兵组织，即“南京大学红色造反派”，“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和“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这些组织的头头文凤来，曾邦元，胡才基等人后来又成为南京地区全市性派性联盟“江苏省红总”，“南京八二七”和“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主要头头。因而毫不夸张地说，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源地和推动当地运动发展的火车头。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是南京地区最大的国营军工企业之一，也是当地工人运动出现最早的单位之一。长江厂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成员陈克兴、鲁学智后来成为全市性工人组织“江苏省工总”的领导人。“省工总”也是左右南京群众运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是南京地区重点高中之一，也是当地中学红卫兵运动开展最早的单位。该校学生中汇集了大量的军队干部子弟、省市干部子弟和知识精英阶层子弟。以军队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造反军”是南京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它和以省市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占据校内主导地位。其后随着“血统论”受到批判，原先受到排斥的学生们成立“红色造反联合会”，很快成为该校最大的群众组织。“红联”的头头沈立智后

来又成为全市性群众组织“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头头。

选择这三个单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还因为这些单位的文革运动资料比较丰富、完整。这些材料包括：一，《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官方媒体对南京大学、长江机器制造厂运动情况的详细报道；二，南京地区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主办的出版物，当时的传单，和南京市档案馆 1985 年编辑的“南京文革大事记”。另外，南师附中一批校友不久前创办了一个“老三届”网站，其中的“文革讨论区”汇集了不少当年的资料、照片和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三，本文作者从 2005 年开始做了大量的文革亲历者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南大的胡才基、葛忠龙（文凤来的重要助手之一。文凤来和另一个重要助手张建山均死于 1976 年）、曾邦元，长江厂的鲁学智、孙树楨，和南师附中的沈立智、王虹等人。这些资料可以生动地再现当年各单位运动的一般情况。

本文想说清楚的几个史实性问题是：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是如何兴起的？为什么卷入运动的人都宣称效忠毛泽东和党中央，却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些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是如何与单位以外的群众组织发生联系的？人们如何在派性斗争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立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引导我们思考以下一些理论问题：文革期间究竟有几种类型的“造反”？人们的派性分野是否与他们对现存体制的看法有关？群众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还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地方群众运动与北京精英政治的关系如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革运动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一、群众运动的兴起

迄今为止，人们对南京地区运动初期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有一份资料显示，在 6 月间，南京市的 19 所高校共贴出 24 万张大字报，被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多达 5700 余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陈光传》第 22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另一个材料显示，截止 6 月 20 日，全市 47 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 1626 人，占教职工总数的 24%。（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油印本初稿第 5 页，1985）第三份资料

显示，进入7月份以后，江苏省65个省级机关中有57个开展了运动，贴出大字报40多万张；全省32个高等院校全部夺权，648个高级中学和中等技校都停课造反，其中仅南京的19所高校，被重点批斗的就有404人。（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20-5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这个资料显然涵盖了7月至10月的发展情况。然而除了几组孤立的、抽象的数字外，这些材料都没有涉及大字报的起因和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分析那些贴大字报的人和那些被打倒的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资料得出的结论，仅限于南京地区的文革群众运动始于6月，而且来势非常迅猛。

根据笔者的研究，南京地区各单位的群众运动的确都兴起于6月初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以后。但是在一哄而起的表象背后，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群众运动的兴起一方面与外部形势的推动有关，另一方面与单位内部的政治有关。以下是关于三个单位的分析。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一。（南京大学的前身有两个，其一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其二是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后，将上述两所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南京大学”，隶属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期间，当局又将该校工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等院系分离出去成立独立的大学。南大遂由一所综合性大学降格成为一所文理学院。直到1959年，经过南大领导人的多次努力，该校才由一所地方高校成为教育部所属院校。南大在当地高校中的领袖地位由此确立。由于上述历史背景，南大教师和职员中有不少老“中大”和老“金大”留用人员，一直被当局认为是一个政治情况复杂单位。）“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进行了积极的部署（匡亚明1906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乡村教师家庭。高中毕业后，他前往上海成为一个激进的青年作家，发表过一个

些诗歌，小说和剧本。1920年代后期，他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其后长期在党内担任宣传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包括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1950年代中期，他出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南大工作期间，由于办学理念和领导作风等因素，匡亚明与副书记陆子敏为首的其他党委成员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匡属于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他比较注重学术发展和教师群体的主导地位。得到他赏识和重用的通常是一些“双肩挑”干部和“又红又专”的学生。陆子敏是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初中学历，曾任中共徐州地委秘书长。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陆作为“工农干部”被组织上“掺沙子”调到南大工作，长期分管学校的行政与后勤。因而在考虑校内利益分配时，他比较强调照顾专职政工干部和后勤职工的利益。学校领导层内部的这种分歧与南大群众运动的最初兴起无关，却与后来的运动发展有关。）。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不明，他们只能依据以往的经验（如土改运动，反右运动和社教运动等）来领导运动。南大的具体做法，是成立了校党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办公室”，对全校师生的政治表现和政治态度进行摸底调查，把他们分成四类。其中属于第四类的70多人主要包括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1957年的“右派”分子，少数坚持“白专”道路的老知识分子（例如南大中文系有几个教师专门研究1930年代“左联”问题，发表过一些论著。1966年春北京的“三家村”遭到批判以后，他们便成为潜在的批判目标）和有各种其他“劣迹”的人。一旦需要，他们便会成为文革运动的第一批牺牲品。

然而南大的运动并没有按照校党委的部署发展，相反地，匡亚明自己很快成为运动的牺牲品。

在1964至1965年年间，毛泽东对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文科教育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变革现有大学教育的想法。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

思想，南大党委作出了创办溧阳文科分校的决策，于 1966 年 2 月底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 500 多教师和学生送往溧阳农场，实行“半农半读”实验。此举在文科教师和学生中引起了潜在的不满。6 月 2 日，溧阳分校的学生和教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悉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事件。很快地，溧阳分校也出现了一批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广大师生在长期的政治运动训练下所作出的自然反应，目的在于表明对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支持态度。不过也有少数大字报隐含着对学校领导的批评，其中包括建立溧阳分校问题。匡亚明从 1957 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出发，将 270 多个卷入大字报事件的老师、学生定性为“反革命”和“右派”。更糟糕的是，匡还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将十几个学生干部，其中包括胡才基（中文系毕业班学生，党员调干生，南大学生会主席），孙家正（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烈士子女，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朱英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等人和个别青年教师列为“六二事件”的幕后主谋，加以重点批判。这个情况被汇报到中央后，康生依据毛泽东对北大问题的处理意见，很快做出裁决：南大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匡亚明的镇压反映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应该打倒。（与胡才基访谈。南京。2007 年 4 月 22 日。胡才基之所以知道中央决策内幕，是应为康生在事后与他谈过此事。在中央首长一次接见江苏造反派的谈话中，康生也提到他对南大事件的处理。参见“中央首长论匡亚明”，《新南大》1968 年 1 月 6 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 年 11 月 18 日，载于宋永毅主编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江苏省委得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派出联络组前往溧阳分校，宣布撤销匡亚明的所有领导职务。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人在省委联络员的支持下发起反击，贴出更多揭发批判匡亚明“三反”问题的大字报，由此成为南大校园内的第一批“造反英雄”。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是南京地区最大的国营军工企业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5 年。1949 年中共政权接管后，对该厂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业务行政

关系隶属于中央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织关系隶属于南京市委。

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厂有很多 1949 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中老年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这批“旧人员”与 1949 年后进厂的年轻工人，新分配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在 1964 年“四清”运动以前，该厂党委书记是高祥芝。他是 by 市委任命的干部。“四清”运动开始后，四机部派出一个 600 多人的工作队进驻长江厂领导运动。工作队队长谭佑铭是四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转业军官，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他认为长江厂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烂掉了，因而展开大规模清洗。全厂 104 个中层以上干部中有 49% 的人被划为“高祥芝集团”成员，80% 以上的人被批斗。不少职工也被当做“高祥芝集团”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遭到批斗。（《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 年 10 月 13 日）这不但造成该厂原领导班子彻底瓦解，而且导致工人之间的公开分裂。1965 年底工作队撤离前，谭佑铭任命他的老部下，军队转业干部孙树桢来该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四机部又派来军队转业干部柳金铭担任该厂党委书记。柳金铭和孙树桢依靠工厂里的转业退伍军人，年轻的大学生和青年职工控制了长江厂的领导权。“四清”前的厂级领导干部只有厂长段俊留任。（《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 年 10 月 13 日。《谭佑铭受审记》，《江苏东方红》1967 年 12 月 30 日。《出头鸟”孙树桢》，《江苏工人》1967.11.25。董国强与鲁学智访谈，南京，2008 年 2 月 28 日）

文革初期长江厂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于 6 月 9 日，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作者是蒋震虹、鲁学智。（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3 页）蒋震虹当时是厂党委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她是不久前通过孙树桢从上海调来的。（王虹与孙树桢谈话记录。南京。2009 年 12 月 10 日）鲁学智是 1963 年进厂的退伍军人，党员，当时是厂党委秘书。蒋、鲁的大字报指责厂长段俊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揪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及其庇护者”。其后在 7 月 12 日，该厂设计科部分年轻的大学生

技术人员又贴出《告全厂工人书》，揭发厂长段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南京文革大事记》，第7页）很显然，这些大字报都是与厂党委领导人柳金铭和孙树桢有关系的。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南师附中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49年中共接管后更名为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后，又更名为南师附中。由于历史原因，该校有一些留用的教师和职员。不过南师附中一直是南京地区重点中学，学生中有大量省市委干部子弟，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精英子弟。

文革爆发时，南师附中现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沙尧。他1944年在家乡江苏如皋参加共产党，后来曾经担任过如皋县委宣传部长，南通市体委副主任等职，1954年调任现职。（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沙尧》，《通州日报》2003年10月27日C1版）副校长李夜光是本地中共地下党成员，解放初期参加接管工作，在南师附中创建了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一直在南师附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董国强与王虹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王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文革爆发时是南师附中高三学生）

6月初聂元梓大字报公布后，南师附中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批判某些老教师的“反动言行”。6月9日，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大会，沙尧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宣布全校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此后学校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大字报出自两位党员教师之手，标题是《揪出走资派李夜光》。该大字报对李夜光的指控，一是李夜光在1949年之前曾经去过台湾，是国民党特务（李夜光随即贴出大字报否认这个指控。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并见网上：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http://nsfz67.blog124.fc2.com/blog-entry-158.html>）；二是李夜光反对文革前不久在附中开展的“教育改革”实践。（文革前不久南师附中的教改实践，背景与南大创办溧阳分校相同。当时南师附中是全省中学教改的试点单位，省

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常驻附中，亲自领导教改工作。根据知情人透露，由于教改是毛泽东的指示，没有人敢于提出反对。不过在如何实行教改的问题上，李夜光与沙尧和那位蹲点的副厅长有不同看法。（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此后，又有个别业务骨干教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据称这些新动向与沙尧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的暗示有关。（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而少数学生贴出的批判学校当局在新生录取和典型培养等问题上的阶级路线问题的大字报，则受到沙尧的压制。

二，群众组织的出现和群众派性的形成

本文涉及的三个单位，在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发生和群众的分化情况，各有不同的特点。

南京大学

南大是群众运动发生最早的单位，也是省委最早派出工作队的单位。6月8日，省委先向南京大学派出一个人数不多的联络组。6月15日，省委正式组成由省计经委主任汪冰石为队长，以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为副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南大。7月4日，为了加强南大工作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改派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为南大工作队队长兼南大党委书记。此时南大工作队共有13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省委向南京军区借调的部队干部。（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3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17页）

按照 Walder 的分类，南大工作队本来应该属于保守型。因为南大党委的组织关系隶属于江苏省委，如果完全否定南大党委，必然引发关于省委领导责任的争议。但匡亚明是由中央点名批判的，省委显然无力对他加以保护。因此，南大

工作队实际上应该被归类于混合型。他们进驻南大后的基本态度，是在打倒匡亚明的前提下维护校党委的权威，而校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工作队领导人彭冲手里。

工作队进驻以后，很快与部分激进师生发生对抗。这里主要介绍三件事：

“法四 22 人大字报事件”。溧阳分校发生“六二事件”以后，留在南京校本部的外文系学生（以法文专业四年级为代表）和部分理科学生（以数学系五年级为代表），也于 6 月 3 日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党委的一些错误。这个行动同样招致学校当局的镇压。校党委副书记胡畏和陆子敏应该对此负责。因而当省委工作队进驻时，这些学生希望同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一样得到工作队的支持。然而工作队领导人坚持除了匡亚明以外，南大党委还是好的，不应该被打倒。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自然引发了“法四”和“数五”学生的敌视态度。6 月 18 日，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的 22 名学生贴出了题为《送瘟神》的大字报，指责工作队的保守立场，并提出要赶走工作队。（《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5 页）

“六二〇事件”。6 月 20 日，南大少数激进学生自发组织了批判匡亚明的群众大会。匡亚明和溧阳分校的几个总支书记在会上遭到羞辱和殴打，并被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行。工作队出面制止了激进学生的行为，还在学生中组织了三次大辩论。（《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5 页）这自然引起那些激进学生的不满。

其他师生对“上层领导，下层横扫”政策的反对。为了保护学校党委，工作队进驻以后试图将运动严格限制在“文化革命”的范畴。这样便有一些教师受到错误批判。以中文系为例，工作队进驻以后确定的运动重点是批判“文艺黑线”。中文系教师陈瘦竹，叶子铭，董健等人因为发表过关于 1930 年代“左联”问题的研究文章，被确定为批斗的重点。中文系被送去劳动改造的教师有 8 人，占该系教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人中只有陈瘦竹是系总支委员，算是一个小小“当权派”。而积极参与创办溧阳分校、并在匡亚明的“反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系总支书记康贻宽和副书记徐福基则受到工作队保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工作队、烂党委在中文系的“中层开刀”的横扫罪行》，《八二七战报》1967 年 5 月 3 日。董国强与董健访谈记录，南京，2006 年 5 月 8 日）再以生物系为例，当时宣布了 20 名“坏蛋”，其中大部分是基层干部和一般

教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农奴戟》1967年4月21日）就全校范围看，到工作队撤出时为止，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校级领导只有匡亚明一人，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系总支书记只有生物系的谢家极一人。其他校党委成员和绝大多数总支书记都受到保护。有些总支书记还因为镇压师生有功，得到工作组的赏识和信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农奴戟》67年4月21日）这当然引起部分教师的不满。教师当中最早站出来批评工作队政策的是政治系青年教师文凤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党员，负责教授很多系科的政治课。“法四22人”也是他的学生，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他认为工作队将斗争矛头指向普通教师和学生是错误的，便带头贴出了大字报（董国强与王继志访谈记录，南京，2007年2月27。王的陈述与其他许多访谈者吻合）。

为了遏制校内反工作队的情绪，同时避免与不满的师生产生直接冲突，工作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绝大多数党团员、学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被动员起来，向那些不满分子发起围攻。溧阳分校的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和其他文科学生，部分由于其党员身份，部分由于在溧阳事件中得到省委解救，成为拥护工作队的学生的头头。他们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写大字报，组织游行示威，将斗争矛头指向以文凤来为首的少数教师和“法四”，“数五”激进学生。（卢元伟与崔之清访谈记录，2006年3月1日。崔之清当时是历史系3年级学生。）

8月初，文凤来带领少数支持者前往北京告状，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康生的接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文凤来作为“外地革命教师”代表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又特别提到他的名字。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从北京凯旋以后，文凤来与“法四”、“数五”和其他系科部分激进学生于23日成立了南大第一红卫兵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派”。该组织因十分强调成员的纯洁性，因而规模始终不大，成立时只有32人，其后成员也不超过80人。（《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董国强与耿昌贤访谈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耿昌贤是“法四22人”成员，也是“红色造反派”最初成员。）8月27日，“红色造反派”成员，数

五学生张建山、张世东等人又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数学系青年教师、数五班政治辅导员曾邦元被选为南大“八二七”的领袖。由于参加该组织的政治条件较低，因而一成立便吸引了一大批希望投入文革运动的普通师生。其后成为南大校园内势力最大的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百年史》，第 378 页。《南大红旗战斗队的大后台是什么人？》，《八二七战报》1967 年 1 月 11 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阜宁，2007 年 4 月 14 日。葛忠龙是数学系五年级学生，同时是“红色造反派”和“八二七”的早期成员。）

当时工作队已经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准备从南大撤出。但是“红色造反派”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提出，工作队在撤离之前，必须就他们在南大工作期间的错误做出深刻检查，并为那些被戴上各种反动帽子的老师和学生公开平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工作队便暗中鼓动那些与工作队合作的学生于 8 月 29 日组成“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胡才基等人成为“红旗”的头头。他们强调工作队在南大工作期间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还提出，撤工作队是中央的决定，阻挠工作队撤离就是反对中央的指示。（《南京大学百年史》，第 378 页。董国强与胡才基谈话记录，南京，2007 年 4 月 22 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以后，到 9 月 17 日，南大“红旗”乘“造反派”和“八二七”前往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市性批判大会之机，在校内召开了一个欢送大会，使工作队安全撤离南大。（《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17 页）

为了抗议工作队不辞而别，南大“红色造反派”和“八二七”于 9 月下旬动员了 1300 多人，打着“南大八二七”的旗号赴北京告状。10 月 6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全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南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丁曰泗代表“南大八二七”上台发言，控诉了江苏省委和南大工作队压制群众运动的“罪行”。周恩来在丁曰泗发言后明确表态：“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 error，在学校犯的 error，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10.0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

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红色造反派”和“八二七”赴京人员返回南京后，将工作队成员统统揪回南大批斗。来自南京军区的三位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很快就交代揭发了彭冲在省委领导授意下挑动学生斗学生的情况，以及动用公安机关搜集文凤来和“法四”激进学生“黑材料”的情况。（陈其玠《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随后南大“红旗”与“红色造反派”、“八二七”的争论焦点便由工作队问题上升到省委问题。

长江机器制造厂

长江厂在运动期间没有派驻工作队。但同样在8月间出现了群众组织和派性对立。

8月16日，厂党委指责302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坚持保守立场，压制群众运动，对其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南京文革大事记》，第9页。王虹与孙树桢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陈其昌是旧党委培养的、“四清”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中层干部。这显然是前述厂内“四清”产生的矛盾的延续。

为了抗议厂党委的决议，陈其昌的支持者们组织起来前往南京市委请愿。而厂党委领导人也动员了2000多群众来到市委，坚决要求罢免陈其昌。（《南京文革大事记》，第9页）8月20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市委会议室召集长江厂党委全体成员会议，表示在厂内职工对陈其昌罢官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厂党委作出陈其昌同志停职检查的决定是“不严肃，不郑重的”，“市委不宜批复”（《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0页）。消息传到长江厂后，厂党委的支持者们立即在厂内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指责市委“八二〇指示”完全抹杀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大搞阶级调和，公然包庇牛鬼蛇神过关，给革命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最终目的在于保住自己。（《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南京市委于21日派王楚斌到长江厂做工作，贯彻“八二〇决定”。

当时厂党委书记柳金铭已称病请假，王楚滨要求党委副书记孙树桢向群众宣布市委的决定，遭到孙树桢的拒绝。（王虹与孙树桢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于是王楚滨于当天亲自在长江厂连续召集了五个不同类型的群众会议，提出“谁反对市委指示，就是违反党章，就是没有党性，就是反党。”（《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这样，原来厂内两派势力的冲突便升级为厂党委领导人与南京市委的对抗。8月22日，长江厂2500多党委支持者抬着“坚决反对南京市委‘八二〇’错误指示”的巨幅标语在市区游行，并到省委请愿，要求撤销市委“八二〇”指示。（《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1页。《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

8月26日，在厂党委的支持下，长江厂出现了第一个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其核心成员是查尧文和鲁学智。（《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3页）查尧文是厂党委培养的“毛选学习积极分子”，当时担任某车间计划调度员（《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29日，与厂党委对立的干部群众也在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4页）段俊和陈其昌是该组织的支持者（王虹与孙树桢的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

8月30日，长江“红旗”头头查尧文率领十二个代表前往市委，要求与王楚滨辩论“八二〇指示”。市委拒绝与“红旗”代表见面，还调动大量便衣公安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视。双方对峙一夜以后，王楚滨于9月1日早晨出来接见。此时长江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已有数百人闻讯赶到现场。王楚滨与“红旗”代表辩论了14个小时，依然坚持市委的原有立场（《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

9月2日，长江“红旗”发起一个“千人徒步北上”运动。当队伍行进到安徽滁县时，中央四机部紧急派谭佑铭和另一位副部长前来劝阻。他们听了“红旗”队员的申述后，赞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当场答应把他们的意见转告四机部主要

领导。另一方面，孙树桢也在南京市委的一再催促下，赶来滁县做工作，将北上人员接回南京（《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王虹与孙树桢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

“红旗”北上人员返回南京后，“红色职工委员会”印发了几万份传单，宣称“红旗”队员“北上反革命大暴露”，是“破坏生产”的行为。“红旗”则在市内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指责省、市委领导压制长江厂的群众运动，是“走资派”，而“红色职工委员会”是省、市委的御用工具。另一方面，四机部领导人与南京市委领导人在9-10月间进行了几次会谈。他们一致认为长江厂党委在控制群众运动的问题上软弱无力，决定派一个新党委进驻工厂。11月2日，四机部领导人到长江厂正式宣布这个决定。“红旗”方面随即提出：派新党委进厂是一小撮反动家伙继“八二〇”错误指示后的又一新阴谋。新党委是变相的工作组。派新党委进厂的决定是“一小撮混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的铁证”。“红色职工委员会”则表示拥护四机部和南京市委改组党委的决定，指责“红旗”的立场是“反党”。此时文革运动进一步发展，部党委和南京市委自身难保。长江厂党委的改组工作遂不了了之。11月16日，长江“红旗”与“红色职工委员会”在厂内发生武斗。随后“红色职工委员会”1000多人撤离工厂表示抗议。长江厂遂成为“红旗战斗队”的一统天下。

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长江“红旗”宣布厂内夺权。随即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生产服务站”和“革命群众服务站”。原党委书记柳金铭和副书记孙树桢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成为这些新机构的“领导核心”。（《长江厂红旗战斗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革命领导干部并肩战斗联合夺权掌权》，《新华日报》1967年2月19日）他们的支持者查尧文、蒋震虹、鲁学智等人也在这些新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6月中旬，南京市委向南师附中派出一个工作队。同派往其他中学的工作队一样，南师附中工作队接到的指示是“协助校党支部开展运动”。因而，工作队对校内政治并没有实质性影响。（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2009年12月4日。

其他中学学生的回忆支持王虹关于中学工作队功能的说法。)

南师附中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军”成立于8月12日(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这也是南京地区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该组织的主体成员是军队干部子弟,也包括一部分地方干部子弟,头头是高三甲班的李天燕,王史维,曾小渤。李天燕的父亲是一位解放军少将,文革前调南京军区工作。李天燕在转到南师附中前是北京101中学的学生。曾小渤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王史维的父亲是省委干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李天燕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南师附中最早起来响应文革号召的学生,在7月初贴出《为毛泽东思想而战》的大字报,以正统观念诠释文革运动,将斗争矛头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和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工(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8月11日,他们又贴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这是附中第一张公开批评校领导的大字报。当天,他们又贴出《夺权——交出管理大字报权力》的大字报,敦促学校领导交出管理大字报的权力。(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据知情者透露,“造反军”的建立与他们的政治取向,与北京中学生和哈军工的红卫兵运动有关。(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造反军”成立后,李天燕率领几个同学去北京串联。在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活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南师附中出现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的主体成员是省市领导干部子弟,学生中的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也包括部分军队干部子弟,头头是陈光华,朱汇民,周晓阳等。陈光华是烈士子女。朱汇民是军队干部子女。周晓阳是南师附中第一个学生党员,是校长沙尧培养的学生先进典型(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思想兵”与“造反军”在如何看待校领导的错误问题上意见不同,但他们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在压制其他学生参加运动的问题上存在同盟关系。

8月20日,激进的“造反军”在南师附中召集了批判校长沙尧和工作队的大会。会后还组织了集体游街。工作队队长被迫叼着自己的鞋子游街(王虹《南师

附中文革大事记》)。“思想兵”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他们忙于批判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反对“血统论”的学生。此后“造反军”也放弃了对学校领导和工作队的批判，将矛头指向有各种“问题”的老师和反对“血统论”的学生。他们的“革命行动”包括批斗，殴打，抄家，损毁财物，等等。

在 6 月至 11 月间，遭到批斗和摧残的老师包括李夜光、杨长庚，周钦，陶强等。除前面已有介绍的李夜光外，杨长庚属于“旧人员”，文革前担任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当时对他的指控是“国民党特务”；周钦是校总务处库房管理员，地主家庭出身，平时老实本分。批判他的理由，表明上是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实际上则是他出于工作职责，曾试图阻止一些激进学生到学校仓库抢夺毛笔、墨汁和纸张用于写大字报。陶强是附中数学教师，其丈夫张钰哲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著名天文学家。她家的保姆不慎将一尊毛泽东陶瓷塑像打碎，却诬陷陶强故意打碎毛泽东塑像。陶强因而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http://nsfz67.blog124.fc2.com/>)。

学生当中受到批斗和摧残的人包括陈瑞麟、李得宁、钱南秀、秦志宁、谭钢屏、杨洪仓、钱南秀、孙永明、吴超明等。陈瑞麟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家庭出身没有问题。李得宁的父亲解放前是工程师，家里有两栋房子，解放后被定为“工商业者”。钱南秀的家庭出身也是“工商业者”。秦志宁的父亲是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著名画家。谭钢屏的父母都是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著名画家。他们受到迫害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写大字报批评“血统论”观点，或者散布过对“血统论”不满的言论。谭钢屏还曾发起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兵团”(遭到“造反军”和“思想兵”取缔)。杨洪仓，吴超明的父亲在南京的军队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原来是国民党起义军官。孙永明的父亲是军医，原来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

在 8-9 月间，“造反军”和“思想兵”也有一些潜在的竞争者。他们曾经成立了几个小组织，并就“血统论”问题与上述两大组织辩论(目前已知的大字报包括：何纪宁，杜红月，吴慧蓉，李修竹，郭有莘，秦志宁《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1966 年 8 月 12 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

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1968年8月18日，<http://nsfz66.blog124.fc2.com/blog-category-30.html>；高慧敏《出身不好，也可以去北京串联》，1966年10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红色野战军”。该组织成员的社会成分较为广泛，头头是沈立志（高三学生，其生父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其母是小学教师，后改嫁一解放军军官。沈立志从继父那里得到“红五类”身份，但因生父的关系，长期被视为“家庭关系复杂”。董国强与沈立志访谈，南京，2008年2月4日）、王虹（高三学生，其父早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建国后担任过中层领导职务。董国强与王虹访谈，南京，2009年12月4日）等人。然而由于当时“血统论”占据主导地位，加上“造反军”、“思想兵”得到江苏省委和北京南下红卫兵的支持，所以这些竞争者很难取胜，因而纷纷于9月初外出“串联”，直到11月底才陆续返回学校（在8、9月间，北京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彭小蒙的率领下来到南京，驻扎在南师附中。他们支持“造反军”和“思想兵”的“血统论”立场。9月间，江苏省委授意部分省委干部子弟成立“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南师附中“思想兵”是其下属重要成员。“造反军”在组织上与“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没有关系，但是参加过一些重要行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2009年12月4日）。

“造反军”和“思想兵”控制校内权力期间，随意取缔其他竞争组织，规定哪些学生可以外出串联。对于那些有资格外出串联的学生，他们还规定哪些人可以去北京，哪些人只能去其他地方（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2008年2月24日。沈立志和王虹等人有资格外出串联，但是被禁止前往北京）。针对那些没有资格外出串联的“黑五类”学生，“思想兵”还组织了一次名为“挖烙印”的活动（9月20日，“思想兵”将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组织起来，由少数“思想兵”成

员带领，步行前往南京郊区的陆郎公社，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一面参加秋收劳动，一面进行“政治学习”，深挖每个人思想深处的“阶级烙印”。有些表现较为积极的学生后来被批准参加“思想兵”的外围组织“红卫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本报评论员：《不革命的，滚蛋——致一些小鬼子们》，1966年9月24日。董国强与王虹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这些做法引起很多学生的不满。

进入11月份以后，外出串联的学生纷纷返回学校。他们在外地串联期间已经知道中央文革领导人批评“血统论”的讲话，并且已经贴出过批判谭力夫的大字报。返校以后，他们立即掀起一场批判“血统论”的运动，将斗争矛头指向“造反军”和“思想兵”（他们贴出的重要大字报包括：《我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究竟要沉默到哪一天？》，《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根子在哪里？》，《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谭氏路线”阴魂不散——驳谬论种种》，《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就是错了》，《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8日；《造反军中的一些同志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1966年12月）。这场运动引起其他受到压制的学生们的广泛响应。12月16日，以“红色野战军”、“井冈山革命造反队”、“革命造反军团”、“誓死捍卫毛主席战斗队”和“飞鸣镝”等小组织为核心，南师附中出现了一个反对派组织“红色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红联”组织很快发展到600多人，成为该校最大的一个群众组织。

面对“红联”方面的攻势，“思想兵”始终保持沉默。而“造反军”则宣布改组为“新造反军”，并提出“炮轰省委”的激进口号。（《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1966年12月）“红联”方面随即指出，导致9月以来附中学生运动冷冷清清的

主要原因是“谭氏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影响”。“造反军”和“思想兵”过去压制学生运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与广大学生的根本分歧是“走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因而必须首先发动全校师生彻底批判“造反军”和“思想兵”的错误，深刻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后才能联合起来炮轰省委。（《红色造反联合会声明【第一号】》，1966年12月17日，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1966年12月）他们还指出，“造反军”的改组只是组织上的小变动，是“换汤不换药”。“造反军”方面则强调，“炮轰省市市委”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红联”方面主张在校内批判“谭氏路线”是方向错误，是将矛头对准红卫兵。此后，“造反军”为了表示其革命性，率先在校外贴出“炮轰省委”的大字报。因此，附中学生又分为“校内派”和“校外派”。前者以“红联”为核心，后者以“造反军”为核心。

三，群众组织的跨单位联合

同全国各地一样，南京地区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普遍产生于11月以后。这与中央的政策有关。此前，毛泽东希望以较小的社会动荡为代价，取得清洗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支持周恩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限制工农群众卷入运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1966.09.02；《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1966.09.11；《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66.0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1966.09.14；《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1966.10.30。以上文件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的想法发生改变。这促使中央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毛泽东《在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的谈话》，1966.11；《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1966.11.04；《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络站代

表时的讲话》，1966.11.06；《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1966.11.13；《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1966.11.16；《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1966.11.17；《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11.17；《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1966.11.21；《周恩来在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1.24；《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12.09。以上文件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因而文革群众运动便很快溢出大中学校校园向其他社会阶层蔓延。与此同时，群众组织的横向联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保守派红卫兵组织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南京地区最初出现的跨单位群众组织，不是激进学生们的自发组织，而是得到省委支持的“老红卫兵”。8月间，北京红一司头头刘平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刘志坚的女儿)带领部分同学到南京串联。江渭清亲自与她见面，听她介绍北京市委组织红卫兵的“经验”。(陈其玠《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此后在9月1日，“南京红卫兵总部”宣布成立。该“总部”分为“中学部”和“大学部”。“中学部”的头头韩建中是省委副秘书长韩××的儿子，张××是军事学院负责人张×的女儿。“大学部”的头头张××则是军事学院负责人张×的儿子。(《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5页。《旧省委组织、操纵保皇势力围剿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24日。《“黑字”大本营神学院的内幕》，《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27日。因“总部”红卫兵均佩戴红底黑字的袖章，因而被对立派称作“黑字兵”。“红卫兵总部”设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大院内。)9月20日，以大学生为主体的

“南京高等学校赤卫队”成立，其核心是“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和其他高校的保守派学生组织。9月28日，“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成立。这些组织在对抗激进学生团体、保卫省市的斗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二司

10月15日，南京华东工程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南京航空学院“红旗兵团”，南京师范学院“八三革命造反师”，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会”，南京铁道医学院“八·一八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自发组成全市性的“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南京“红二司”），头头是华工“革反团”头头刘继红。省委“红卫兵联络站”曾经派出工作人员，打着“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熟悉服务对象”的名义与他们联系，试图控制“红二司”核心组。然而“红二司”拒绝了省委人员的介入。

参加“红二司”的组织都是各校内部的激进的少数派。南大和南工的激进学生没有参加“红二司”，是因为他们在校内占据多数。（南工是南京高校中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南大的学校。该校运动初期的情况与南大基本相似。不过由于该校直接隶属江苏省，受到省委的控制较强，因而直到9月15日才出现了第一个激进学生组织“南工东方红战斗公社”。该组织头头是八系毕业班学生罗会龙，汪洵之等人。与他们对抗的保守派学生于9月28日组成“七一战斗团”。此后不久，另一部分激进学生在四系毕业班学生郭公举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南工井冈山”。“东方红”与“井冈山”在1967年1月“夺权”运动前保持同盟关系。董国强与于从俭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于从俭是“东方红”骨干成员之一。）

红三司

南大的激进学生没有参加“红二司”，显然是因为在10月6日周恩来就南大工作队问题做出表态后，他们已经成为校内的多数派。基于同样的原因，南工的激进学生也没有参加“红二司”。但他们都与“红二司”保持着密切的同盟关系。11月7日，由这两个学校激进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

部”（南京“红三司”）成立，头头是南工学生孟庆高和南大学生朱寿章。不过由于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井冈山”本身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们并不隶属于“红三司”。恰恰相反，“红三司”只是南大和南工激进学生组织的影子组织，其主要功能仅限于在动员群众，发表声明时壮大声势。

省红总

成立于 11 月 1 日的“省红总”是由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串联发起的全市性群众组织。其成员包括大专院校激进师生，文化艺术单位的激进分子和部分工厂中的激进分子。该组织的头头包括文凤来、张建山、戴国强（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孔繁洁（新华书店职工）、耿昌贤，李太平（南大生物系实验员）等人。南大激进师生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第一是源于文凤来参加过著名的“八一八接见”，随后又被《人民日报》点名报道；第二是源于南大“八二七”的主张在 10 月 6 日的首都体育馆群众大会上得到周恩来的明确支持。“省红总”一成立，便成为南京地区最激进的跨单位跨行业群众组织，其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 1968 年初。

省工总

“省工总”最初是由南大激进学生发起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1967 年 1 月 28 日改组后，开始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省工总”成立的背景是：10 月 25 日，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单位党组织一律中断领导本单位的文革运动。（《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21 页）这造成各单位党组织的涣散。进入 11 月以后，省市委机关频繁遭到激进群众的包围。省市委领导人为了躲避群众揪斗，纷纷转入地下办公，无法行使其正常的职权。（袁捷、谷病，刘定汉、朱通华等：《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 134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这使得本地各单位群众正常的申诉渠道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对本单位领导不满的群众纷纷涌到“省红总”指挥部请求支持。另一方面，上海“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带领部分随从赴北京告状期间，于 11

月 14 日在南京短暂停留，与南大激进师生和其他单位的群众有过接触。（《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25 页）

显然是受到上海工人运动的鼓舞，南大激进师生于 14、15 日组织许多单位工人代表前往省委请愿，要求成立统一的工人群众组织。省委以“工人成立省市的统一组织，中央没有指示”为由加以拒绝。不满的群众于是涌到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请愿。周恩来闻讯后，于 16 日打电话给省委，同意成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南京文革大事记》，第 25 页）

“省工总”成立初期，成员的社会构成主要是市内一些中小型工厂企业的员工，车站、码头装卸工人，各区县所属市政建设工程队的瓦工、木工、管道工和南京市三轮车协会的工人，等等。勤务组成员包括施威，姚金璜、耿昌贤，陈克兴，黄秀琼等人。施威，姚金璜，耿昌贤都是南大法文专业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骨干成员。他们是“省工总”的发起者和实际主持者。陈克兴是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成员，工人家庭出身。但他参加“省工总”并不是一种组织行为，而是基于他与南大激进学生组织的私人关系。他的弟弟陈克云是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也是南大“红色造反队”成员。南大激进学生将他拉进“省工总”勤务组，无疑是为了借助长江厂“红旗”的社会声望。黄秀琼是南京金笔厂统计员，在“省工总”担任秘书长职务。（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 年 2 月 1 日。《彻底粉碎原工总执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红色工人》，1967 年 3 月 1 日）

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

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曾向陶铸汇报江苏省委面临的困难处境。陶铸指示江渭清派人到上海，湖南和广东“学习”当地领导人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报》，1968 年 1 月 21 日）此后江苏省委根据各地的经验，一方面与激进的群众组织接触，表示积极支持群众运动；另一方面暗中支持保守派群众成立了“工人赤卫队”，与激进群众组织对抗。“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正式成立于 11 月 19 日。其成员主体是各工矿企业内部的党团

员、基层干部、老工人、劳动模范和政治积极分子。该组织与保守派红卫兵（“黑字兵”）存在同盟关系。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下旬，“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当“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如匡亚明，陶白，孙叔平等人。当“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组织群众围攻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动员群众保卫省市委。

南京八二七

“南京八二七”是“南大八二七”的影子组织，正式成立于 12 月 20 日。“南京八二七”的成立，部分源于省委的分化策略，部分源于南大“红色造反队”与南大“八二七”的潜在竞争关系。根据“八二七”领导人曾邦元的说法，南大“八二七”与南大“造反队”的差异表现为：“八二七”方面的所有决策和行动都以中央已经公开发表的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为依据；而“造反队”方面则会根据各种小道消息和自己对最高层战略意图的揣测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董国强与曾邦元访谈记录，南京，2007 年 12 月 13 日）这个说法得到其他一些材料的证实。“南京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时，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大会，也表明省委对“省红总”/“省工总”与“南京八二七”的不同态度。

“南京八二七”的头头是康炳成、李效蟾、周文昌等人。康炳成是南大生物系园艺工。李效蟾是南大生物系实验员。周文昌是数学系教辅人员。他们都是南大“八二七”成员和曾邦元的拥护者。“南京八二七”包括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群众，但是其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江苏东方红

“江苏东方红”是“南工东方红”的影子组织，正式成立于 1967 年 1 月 25 日。该组织成立时，学生、工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群众早已被先前成立的群众组织吸收，因而它只能以郊区的农民为主体。“江苏东方红”的名义头头是溧水县回乡知青徐高兰，但实权操纵在“南工东方红”头头手里。（董国强与于从俭谈

话记录，2009年12月10日)

四，群众组织跨单位联合对各单位内部运动的影响

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是否与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发生关系，以及与哪个群众组织发生关系，取决于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南京大学

南大是文革初期江苏群众运动的发动机。南大“红色造反派”和南大“八二七”都是自发的群众组织。而南大“红旗战斗队”则是省委和南大工作队为了应对“造反派”和“八二七”扶植起来的群众组织。

“红旗战斗队”成立以后不久，由省委支持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高校赤卫队”先后成立。南大“红旗”自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团体成员。在9月份中央没有就南大工作队问题明确表态之前，南大“红旗”持拥护工作队的立场。他们还在省委联络员的指使下，贴出攻击文风来的大字报，罪名是“反工作队”，“反省委领导同志彭冲”。（《揭开“南京红卫兵直属纠察司令部”的黑幕》，《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孙晓萍《彻底揭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孙晓萍是南大“红旗”副队长。其父孙海云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9月17日，乘“造反派”和“八二七”成员赴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之机，南大“红旗”在校内组织了欢送工作队的大会，使工作队安然撤离南大校园。10月6日周恩来公开表态支持“八二七”的主张之后，特别是工作队副队长“梁、杜、吴”公开检举揭发工作队的问题后，“红旗”也掀起一场“批判工作队”的运动。但是他们批判的重点是“梁、杜、吴”。（《形左实右的集中大暴露——评11月28日红旗战斗队等组织的大会》，《八二七战报》1966年11月29日。《红旗战斗队的矛头又指错了》，《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3日。《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11月下旬，省市主要领导先后在群众

大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南大“红旗”和其他高校保守派组织也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他们要求省委尽早改正错误，“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 11 月下旬南大激进学生挟持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前往北京告状，并在陶铸的斡旋下于 12 月 5 日达成“八项协议”（《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66 年 12 月 5 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江苏省革命造反派与省委达成的八项协议》，《红卫兵报》1966 年 12 月 27 日。《八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省市委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省市委立即清查、销毁所收集的全部“黑材料”；省市委领导人公开做出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省市委公开办公，有事与革命造反派协商；等等。）以后，南大“红旗”和“南京赤卫队”的工人群众一道前往省委请愿，要求省委废除“八项协议”，转而同意他们提出的“七项要求”。当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南大“红旗”头头窦长春等人于 12 月中下旬挟持许家屯前往北京告状。不料他们与“造反派”和“八二七”派去北京请愿的代表团在北京遭遇，许家屯被对立派抢去，窦长春则被强行押送回南京。南大“红旗”与“造反派”和“八二七”的校内对抗一直持续到 1967 年 1 月初。

南大“红色造反派”与“八二七”在反对“红旗”的斗争中存在同盟关系，但是在领导校内外群众运动方面却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造反派”对于参加者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因而成立时只有 32 个人，鼎盛时期也不过 80 人左右。但他们的骨干文凤来、蔡福星、姚金璜、耿昌贤等人都是一些“老造反”，在反对工作队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性，文凤来、耿昌贤等人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过毛泽东的接见，因而在南大和南京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按照耿昌贤的说法，“八二七”的创办者张建山、葛忠龙等人也是“造反派”早期成员，“造反派”勤务组最初决定派他们组建“八二七”，是希望“造反派”有一个社会成员更广泛，人数更多的外围组织。不料张建山等人依靠数学系五年级的骨干力量拉起队伍以后，又请他们的政治辅导员曾邦元出山担任领袖，使“八二七”成为一个与“造反派”竞争的组织。（董国强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 年 2 月 1 日。但是葛忠龙否

认这个说法，强调“八二七”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由于加入“八二七”的门槛较低，一经成立便吸引了大批南大师生，成为南大校园内势力最大的群众组织。而“八二七”在社会上的声誉鹊起，始于9月底至10月初的“千人北上”告状行动。

“八二七”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向外发展横向联系。“造反派”则相反。他们在失去校内多数以后，很快便将目光转向社会上其他激进势力，于11月初拉起了“省红总”和“省工总”。进入12月以后，南大“八二七”也开始筹建全市性组织。由于各校激进学生、各文化艺术单位的激进分子和市区各工厂的激进分子已经被“省红总”和“省工总”吸纳，南大“八二七”不得不主要在高校后勤系统工人中和中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势力。12月20日，“南京八二七”成立。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南京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群众组织与南大造反派中的派性裂痕有关。另一方面，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横向联合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南大学生之间的派性认同。特别是“造反派”和“八二七”之间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关系，其后对南京地区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江机器制造厂

长江厂的群众运动最初是在厂党委的动员下开展起来的。最先成立的“红旗战斗队”很快发展到近3000人，后台就是党委主要领导人。（董国强与鲁学智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8日）这种关系结构决定了他们必然在厂内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11月16日长江“红旗”将对立面“红色职工委员会”驱逐出工厂以后。因而长江“红旗”没有与外单位造反派联盟的需求。“红旗”成员陈克兴与南大激进学生发生关系纯属个人行为，并非“红旗”勤务组的决定。长江“红旗”也不是“省工总”的下属组织。当然在当时条件下，“红旗”勤务组并没有出面禁止陈克兴的行动。陈克兴的活动包括11月14日在南大与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见面。11月14、15日参与“省工总”发起、组织工作，并被选为“省工总”勤务组成员。11月19日参加南大激进学生召开的“揭发批判彭冲大会”，并在会上揭发省市委策动“红色职工委员会”挑起武斗的“罪行”。

长江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在厂内是少数派，一度发展到 1000 多人。他们在 8 月至 11 月间依托市委的支持在厂内与“红旗”对抗。11 月 16 日武斗以后，他们在省市市委和四机部领导的护送下撤往南京栖霞区十月公社，随后加入了南京工人“赤卫队”。直到 1967 年 1 月初“赤卫队”垮台以后，这些人才返回长江厂。此后他们遭到“红旗”方面的报复，许多人被恐吓、殴打、扣发工资，甚至遭到非法监禁。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南师附中的“思想兵”在 9 月初“南京红卫兵总部”成立时，即作为团体成员加入。“造反军”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南京红卫兵总部”，但是在 9 至 11 月间参加了“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的一些行动。进入 12 月以后，“思想兵”依然坚持保卫省市市委的立场，直到他们随着省委的垮台而解散。“造反军”则通过高层关系获悉中央的最新态度，因而率先在社会上贴出“炮轰省市市委”的大字报。但该组织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没有发生关系。

南师附中“红联”可以说是在南大“八二七”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红联”负责人沈立志回忆说，由于当时附中校内“造反军”和“思想兵”势力很大，所以对立面的学生在与他们抗争时，希望得到校外盟友的支持。而此时南大“八二七”也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建立全市性组织。沈立志坦言，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南大“八二七”与“红色造反队”的竞争关系。如果南大“造反队”先派人与他们联系，他们也可能决定加入“省红总”。（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南京，2008 年 2 月 24 日）由此可见，“红联”不会选择“红卫兵总部”是肯定的；然而选择参加“八二七”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12 月 20 日，“南京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宣告成立。同日，“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也宣告成立。附中“红联”沈立志是“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之一。“红联”另一个重要成员翁越飞成为“八二七”大头目曾邦元的秘书。此后附中“红联”的另一个名称是“八二七南师附中分部”。

五、江苏“夺权”前后群众组织的分化重组

如上所述，到 1966 年 12 月底以前，南京地区出现了“红卫兵总部”、“南京高校赤卫队”、“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红二司”、“红三司”、“工人赤卫队”、“省红总”/“省工总”、“南京八二七”等几个全市性群众组织。各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与上述组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统属关系。

进入 1967 年 1 月以后，三个重大事件导致了全市性和各单位内部群众派性格局的改变。其一是“一三事件”，其二是“一·二六夺权”，其三是“一·二八工总改组”。

一三事件

“一三事件”是南京“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决战。其大致经过笔者在《南京“一·三事件”浅析》中已有记叙（见《记忆》总第 67 期，2011 年 1 月 30 日），此处略。

“一三事件”以后，“南京工人赤卫队”，“南京红卫兵总部”，“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和各单位保守派组织纷纷瓦解。

一·二六夺权

1967 年 1 月上旬，上海率先发生造反派向市委和华东局夺权事件。此举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周恩来出于政治权宜的考虑，于 1 月中旬指示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南京军区尽快实施夺权。（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issue, 2010.）于是在 1 月 22 日至 25 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头头在新街口中苏友好馆召开联席会议，具体商议夺权问题。其间“省红总”与“南京八二七”就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发生争议。“八二七”方面试图以退出行动相威胁，迫使“省红总”做出让步。加入抵制活动的主要是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和由南大，南工学生组成的“红三司”。但“省红总”领导人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其他激进势力发动了“一·二六夺权”。南京军区也对夺权行动表示了支持。随后以“省红总”及其支持者为主体的“夺权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受到排斥的“八二七”及其支持者当然不甘心。他们很快策动了一场关于“一·二六夺权”的争论。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成两大

阵营：以“省红总”、“省工总”、“红二司”和其他激进组织为一方，以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和“红三司”为另一方。前者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后者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这就是所谓“好派”和“屁派”名称的由来。

一·二八工总改组

如前所述，11月中旬成立的“省工总”其实是“省红总”的影子组织，其核心组实际控制在南大“红色造反派”成员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人手里。该组织的下属成员多为市区中小型工厂职工、车站码头装卸工、各区县市政建设工程队的建筑工匠和三轮车协会工人。1月25日，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通过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邢文举等人向“省红总”头头文凤来和南京军区负责人发出指示，“江苏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组织不纯，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的。”（《南京文革大事记》，第40页）根据这个指示，“省红总”勤务组与南京军区负责人决定对“省工总”实行改组。其具体方案是从长江机器制造厂、南京晨光机器厂和其他几个大型国营军工企业的群众组织中抽调成员组成新的“省工总”勤务组。（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1月28日，长江“红旗”、晨光“革联”（南京晨光机器厂运动初期受到省市的严密控制，保守派工人组织一直占据厂内主导地位。由激进的少数派组成的“晨光厂革命职工联合会”于11月10日成立于南工校园。《南京文革大事记》，第24页。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阜宁，2007年4月14日）和其他60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指责现任“省工总”勤务组成员陈克兴、施威、黄秀琼等人大搞特权腐败，肆意助长“经济主义”歪风，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并宣布成立以晨光“革联”头头朱开地、长江“红旗”头头鲁学智为核心的新的“省工总”勤务组。（《我们为什么要彻底改组“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派工人答群众问》，《农奴戟》1967年2月8日。《彻底粉碎原工总执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红色工人》

1967年3月1日)原“省工总”勤务组成员陈克兴等人随即提出,“省工总”改组是长江“红旗”策动的一场“宫廷政变”,是“一小撮臭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分裂江苏工人运动的一大阴谋。他们不但拒绝交出权力,还于2月4日动员其拥护者向长江“红旗”等组织挑起武斗。(《南京文革大事记》,第44页。《江苏省九十三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声明》,《农奴戟》1967年2月8日。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由此“省工总”分裂为“新工总”和“老工总”。“新工总”支持“好派”,“老工总”支持“屁派”。

上述几个重大事件,也对各单位内部的派性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是各单位情况的后续发展。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在“一三事件”以后不久就宣布解散。其下属成员要么成为“逍遥派”,要么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头头则被边缘化,直到1968年秋天毕业离校。

由于“红色造反派”坚持其发展成员的高标准,大部分参加造反派的“红旗”成员加入的是“八二七”下属组织。不过在“夺权”前后,南大“八二七”也发生了分裂。首先是“八二七”勤务组内形成了以张建山、曾邦元为首的两个圈子。张建山的拥护者多为一些激进学生,曾邦元的拥护者多为一些青年教师、教辅人员、后勤工人和一批年龄较大的“调干生”。(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阜宁,2007年4月14日。葛忠龙是张建山的拥护者)张建山等人积极介入“一·二六夺权”,因而夺权后得以进入“夺权委员会”。(《一二六夺权前后》,《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7日)曾邦元等人则反对“一·二六夺权”。

“好”、“屁”之争发生后,张建山及其拥护者100多人宣布成立“南大八二七夺权大队”,脱离了“八二七”主流派。另外一些“八二七”下属组织负责人认为,“省红总”在实施“一·二六夺权”时没有很好地贯彻“联合夺权”的方针,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夺权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能轻易否定。(董国强与

王继志谈话记录，南京，2007年2月27日。王继志原为“八二七”下属“星火燎原战斗队”头头，后来脱离“八二七”成为“好派”。其他一些人认同“夺权”主要基于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夺权是中央的号召；第二，南京军区支持夺权；第三，夺权以后《新华日报》正式发表了夺权声明。葛立新《从“好得很”到“好个屁”——谈谈我对“一·二六夺权”看法的转变》，《红色造反者》1967年3月3日）这些组织后来也遭到“八二七”主流派的排斥。另一方面，南大“红色造反派”在校内派性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孤立，也希望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同盟者。于是在1967年3、4月间，南大“红色造反派”与从南大“八二七”中分裂出来的“八二七夺权大队”、“八二七兵团五一战联”和“兵团一月革命师”组成南大“红四联”（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与南大“八二七”主流派在校内形成对抗。

1968年以后绝大部分学生陆续毕业。但是参加两派的教职员工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

长江机器制造厂

如前所述，长江“红旗”自成立之日起便在厂内占据近主导地位。11月16日“红色职工委员会”被逐出工厂以后，“红旗”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并没有寻求外部同盟的动力。因而他们并没有加入11月中旬成立的“省工总”，也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行动。如果不是张春桥的指示和“一·二八工总改组”，他们本来不会卷入“好”、“屁”之争。但是“省工总”改组后，长江“红旗”成为“好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头头鲁学智是“新工总”的第二号人物。而原“红旗”成员、“省工总”的创建人之一陈克兴则因为这次改组，成为“屁派”的一个重要头头。

不过由于陈克兴长期游离于长江“红旗”以外，所以他投向“屁派”并没有造成长江“红旗”的分裂。夺权以后长江厂内部的派性斗争实质上依然是“红旗”和“红色职工委员会”的斗争的继续。在1967年2月底，以原来的“红色职工委员会”为基干，长江厂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反对派组织“二二七”。受到厂党委

压制的陈其昌等人很快宣布支持“二二七”。(王虹与孙树桢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然而“二二七”的出现并没有危及“红旗”的主导地位。两派厂内政治地位的相互转换发生于1967年秋后。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在12月中旬“红联”成立时,南师附中校内的派性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三事件”后,“思想兵”彻底瓦解。“造反军”虽然没有彻底瓦解,但是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通过家庭关系参加了解放军。

南师附中“红联”在“一·二六夺权”以后的分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如前所述,12月中下旬“红联”方面与“南京八二七”结成联盟完全是一个偶然的选。但是对有些人而言,这次选择造就了一种组织忠诚。“一·二六夺权”后,“省红总”为了反击“八二七”方面的宣传攻势,向各方表明这次夺权是“联合夺权”,希望在1月30日召开的“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有“八二七”代表做支持夺权的发言。张建山是南大“八二七”创始人和勤务组成员,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与“省红总”和“夺权委员会”的关系,因而不合适做这样的代表。于是张建山、葛忠龙找到附中“红联”头头沈立志(他同时是“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勤务组头头),鼓动他在大会上发言。这个要求遭到沈立志的拒绝。沈立志认为附中“红联”作为“八二七”下属成员,应该听从“八二七”总部的统一号令。(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4日)此后,张建山、葛忠龙又找到“红联”勤务组的另一个成员何立群。何立群是“红联”下属附中“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的头头。他后来以南师附中“红联”和“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名义在五台山大会上发言(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4日。《一二六抢印委员会罪行种种》,《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3日)。附中“红联”主流派随即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指责何立群是“分裂主义者”和“个人野心家”,指责他的发言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南京八二七南师附中红色造反联合会:《严正声明》,1967年1月31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

1968年8月18日)此后“井冈山”宣布退出“红联”，成为“好派”在附中的下属组织。这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68年这批学生“上山下乡”之前。

结论

通过对南京三个单位群众运动情况的深入考察，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尽管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与北京的号召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但是决定运动走势和派性认同的更重要因素是此前各单位的内部政治。这三个单位在运动初期都有一个正向动员的阶段。这种正向动员一方面表现出单位领导人对中央号召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又与单位内部的斗争有关。正向动员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打击潜在的对手。长江厂和南师附中的情况是最好的例证。南京大学的运动后来没有按照匡亚明的计划发展，是由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

第二，由于上述正向动员的存在，因而介入6月初第一批大字报事件的人并不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和反对者，而是一些现行体制的基本依靠力量。南大的运动没有按照匡亚明的计划开展，但实际的结果还是一样。这个事实构成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极大挑战。这些人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这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南大的第一批“造反英雄”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人是在与学校领导匡亚明的冲突中涌现出来的，因而可以被归类于“造反派”。但他们后来在工作队和省委问题上却持鲜明的“保守派”立场；长江“红旗”最初是在厂党委支持下成立的，无疑应该被归类于“保守派”。但他们后来对省市市委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并与其他单位的激进派结成“好派”联盟；南师附中“思想兵”和“造反军”是南师附中运动初期的激进力量，他们在对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太纯正的学生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老子同老子斗，儿子同儿子斗”，“次反必造，同学必斗”（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但是后来“思想兵”在对校领导、工作队和省市市委的问题上持鲜明的“保守派”立场；“造反军”则随着运动走势的变化，先后提出“校内夺权”和“炮轰省市市委”的口号。由此可见，所谓“造反派”或“保守派”并不是

一个恒定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差异仅限于“造反”对象的不同。

第三，各单位第一波造反者与后起的造反者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从政治社会学提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去进行分析，很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例如南大“造反派”、“八二七”头头文凤来、曾邦元、张建山等人有着与其对立面“红旗”头头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人相似的政治背景。长江厂“红色职工委员会”是由一批老工人和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组成的，政治纯洁性并不比“红旗”差。只有南师附中“红联”的情况有所差异，但其头头们也不是“黑五类”子弟。他们与“造反军”、“思想兵”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在中共政治语境中“红区党”与“白区党”的等级差异，正统的红军战士与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的等级差异，以及政治精英集团与知识精英集团的等级差异。这些差异基础上的矛盾，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处于较低等级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并不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他们所争取的仅限于表明自己政治忠诚的权利。

第四，夺权前后“省红总”与“南京八二七”的对抗，以及南大内部“红四联”与“八二七”的对抗，南师附中“红联”与“井冈山”的对抗，和“新工总”与“老工总”的对抗，更能说明派性冲突与家庭出身、政治网络关系等因素无关。人们的派性认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运动走势和十分频繁的相互碰撞中形成的，并不断发生变化的。

第五，暴力倾向与施暴程度也很难作为划分“激进”与“保守”的标准。在1966年秋冬表现较为温和的南大“八二七”、长江“红色职工委员会”/“二二七”、南师附中“红联”，在1968年夏天“清队”期间对无辜者的伤害程度，并不亚于运动初期南大“红旗”、长江“红旗”和南师附中“思想兵”、“造反军”对所谓“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伤害。

在厘清了上面几个问题后，我们还将进一步指出：文革群众运动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它是官僚政治体制框架下的瞬间性的群众政治参与。导致群众（包括许多单位领导层）最初卷入运动和持续的派性斗争的基本动力，部分是对自己切身利益的考量，部分是对极权政治体制下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的高度恐惧。群众派性持续存在的最重

要的原因，是当时整个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宗派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这样一场混乱的政治运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

【争鸣】

按：《清华蒯大富》一书出版后，有关韩爱晶等曾到清华大学调解武斗一事引起一些争论。陈楚三给孙怒涛的这封信代表了争论中的一种意见。陈楚三、孙怒涛，均为当年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委员。

关于清华大学武斗调解的通信

陈楚三

怒涛兄：

关于老蒯所提停止武斗一事，我已经看到有关通信往来内容；我也很关注。

韩爱晶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这是韩的书中记载并一再坚持，而沈如槐断然否认的。韩的书中并没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你我在宛平当面问老蒯时，他答是68年7月上旬；孙耘则引用韩爱晶说法，是5月上旬。

米鹤都采访、老蒯口述的正版《岁月流沙》（以下简称《流沙》；正版口述已经更名为《潮起潮落》，因与马小庄陈继芳的书名相同，所以我仍用原名），概述了清华武斗过程；而韩爱晶所写、老蒯阅看并认可的《清华蒯大富》（以下简称韩书），也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清华武斗过程并有不少比较客观的评论。

对比《流沙》和韩书对于清华武斗的叙述，虽有所不同，但在至少两个重大关节点上却是一致的：一是武斗发生的关节点，他们都说，414抓陶森是“武斗的导火索”；二是武斗停止的关节点，蒯说在武斗死了人后，他就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坚决不同意”，韩书则说，韩爱晶、王大宾、鲁文阁曾经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韩在给你的信中说“调解

武斗失败”。

给读者的印象，是414点燃了清华武斗的导火索；武斗开始后，蒯大富“后悔”了，想停止了，又是414“坚决不同意”，所以才一直打到“7.27”。你看，是414挑起了武斗，也是414拒绝停止武斗，清华武斗的责任不就应当由老四承担吗？

怒涛兄应当记得，2009年底你给我发来叶志江的《救美》网文，说我是科学馆的卫戍司令、带着人给他“下马威”云云，我给你回信予以否认；但因是网上文章，我并未理会。今年叶志江出版了《走出文革》一书，《救美》亦在其中；白纸黑字，我不能视若无睹，于是致信叶公，提出异议。现在，《流沙》虽是网文，韩书可是白纸黑字，所以我不能不予理会。

怒涛兄关注“韩爱晶来清华调解武斗”的事是否发生过。我则既关注韩爱晶是否确有“调解清华武斗”的行动；更关注蒯老弟是否真的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涉及清华武斗的责任问题，在40多年后的今天竟然还有争议，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

《流沙》说：“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韩书也说：“414绑架团派干部陶森，两派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导致清华百日武斗的导火线。414对百日武斗有严重责任！”

如果说，韩爱晶对清华团派的作为不甚了解（也可能是不愿了解，或者“为尊者讳”），也就罢了；但老蒯也这样误导读者，我就不得不质疑了：414抓陶森是68年4月20号的事，可是团派早在1967年12月4日就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吕应中，68年1月30号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罗征启，3月27日又绑架了支持414派的干部贾春旺等人，4月4日绑架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并致其死亡，4月14日又绑架支持414派的干部文学宓等人（见邱心伟书）。这些事实，老蒯是不知道，还是有意回避呢？

老蒯和老崔（兆喜）在宛平聚会时向我道歉，原因就是团派保卫组曾于1967

年12月20日绑架并残酷殴打我。在绑架我的那一天，20多名支持414的干部和教师被团派抄家，41名414的各级负责人被团派点名“通缉”（见邱心伟书），难道老蒯的这些动作对414还不“重”，还不“过”吗？

在绑架我之前的1967年10月20日，团保卫组就曾闯入我所在战斗组活动的房间，绑架并毒打我班同学李××；1968年3月16日，团保卫组又在圆明园绑架了我班同学邢××，刑讯逼供近五个月，直到工宣队进校后的8月份才被释放。据邱心伟书中记载，到1968年6月上旬，团派扣押四派多达70余人。

为什么团派接二连三地抓、打414的头头，肆无忌惮地绑架414派学生和支持414的教师、干部，好像都和武斗无关，而414一抓陶森，就成了武斗导火线呢？请问蒯、韩二位，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二）蒯老弟，你真是“巴不得停止武斗”吗？

《流沙》提到：“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后悔了。”“当时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

我们不知道老蒯是否真想停止武斗。除了1967年4月15日冲广播台是老四主动挑起的以外，其余较大的冲突都是团派主动挑起。因此，如果老蒯真想停止武斗，很简单也很容易：解除对414头头的“通缉令”，保证414头头的人身安全；停止绑架414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已经绑架的立即放人，两派交换“俘虏”；停止攻打414的据点，解除对414据点的封锁，让414自由进出科学馆、自由进出学校；然后两派拆除工事。老蒯只要这样做了，清华武斗自然斗不起来。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老蒯指挥下的团派实际做的又是什么？

按老蒯对你我询问的回答，韩爱晶等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7月初；可是，7月4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朱育生；7月5日，团派开枪打死科学馆杨志军；7月6日，团派开枪阻止414给科学馆送菜的土坦克，打死杨述立；7月9日，团派火烧科学馆；7月16日，团派炸塌科学馆414为外撤所挖的地道；7月18日，团派开枪打死从外地回校的女生钱萍华。这些血的事实，与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说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如按韩爱晶的说法，韩等三人找沈如槐谈停止武斗，发生在5月上旬；那

么：5月2日，团派攻打土木馆；5月7日，团派绑架校人事处朱坚等6名414派；5月8日、9日，团派绑架谢引麟等三名414派女生，关押、拷打3个月之久，还绑架了姚毅、赵汝广同学；5月10日，团派攻打科学馆、动农馆；5月12日，团派攻打8号楼；5月14日，团派攻打汽车楼；同日，团派绑架孙华栋，并将孙华栋活活打死；5月21日，团派再次攻打汽车楼；5月30日，团派攻打东区浴室。面对这些事实，我又怎么能相信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呢？

韩书中提到清华“5.30”武斗时，援引了老蒯的回忆说：“当时有人摔死了，我们攻不下来。我就下死命令叫他们不要再冲，他们还往上冲”。老蒯“下死命令”却不起作用，如果此言不虚，也许老蒯当时已经控制不了团派的大局了？也许，蒯老弟确实想叫停武斗，而一些团派头头坚决要打而否定了蒯的意见，这是真的吗？

（三）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吗？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群体对特定事项的反应，是可以合理推断出来的。

如果“414拒绝停止武斗”真有其事，老蒯当时能不知道吗？团派的其他头头能不知道吗？对于团派来说，“414拒绝停止武斗”难道不是一个求之不得、应该大肆宣传、大做文章的绝好题目吗？然而，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却没有听到团派广播与此相关的任何一篇文章；时至今日，除了老蒯，也从来没有听到团派的其他头头说起过此事，包括在宛平聚会中，你我就此质疑老蒯时，在场的其他团派头头也不予置评。

老蒯当年知道“414拒绝停止武斗”的消息吗？你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这段话似乎表明你当时就知道此事；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将此消息告诉其他头头和你的笔杆子？从那时起40余年过去了，你在《流沙》中才第一次披露此事，竟然保密40余年！？如此匪夷所思，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包括你老蒯在内的团派头头以及团派的笔杆子们，当时并未听说过此事。若果如此，这只能说明，“414 拒绝停止武斗”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真的有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武斗找上门来谈，就我所了解的沈如槐，在当时“团强四弱”的形势下，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就老四的决策传统，他更不可能背着其他老四头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擅自表态。韩爱晶说当时还有其他老四的人在场，可是 40 多年来，从未听到任何一个 414 头头或非头头提到过此事。这也只能说明，韩爱晶根本没有找沈如槐谈过停止武斗的事！

40 多年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414 拒绝停止武斗”的“新闻”，难道还不够荒唐吗？

（四）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

《流沙》说，关于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头儿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

按常理，《流沙》中“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这句话应当是转述韩爱晶的话；但是韩书中并无此话，韩给怒涛兄的三封信中也无此话，只说“沈的态度（按：指沈说蒯是“蒯匪”）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因此，所谓“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一类的话，如果不是韩爱晶“遗忘”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就是老蒯强加给韩爱晶的，是老蒯的杜撰，而韩爱晶出于某种原因又不便否认。

韩书中，对调解停止武斗的表述与《流沙》不同，很耐人寻味，请看：

“韩爱晶、鲁文阁和王大宾等到清华找到414总部，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按照原来所谓天派、地派的关系，414派和地质王大宾较密切。虽然如此，对话时，沈如槐坚持说蒯大富是‘蒯匪’，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当场也气得高声喊起来，王大宾也认为搞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

请注意，韩书中虽然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但后文却只涉及联合：沈如槐“不同意以蒯大富为一把手的联合”，“王大宾也认为搞

大联合必须承认蒯大富为一把手”；而涉及停止武斗的内容连一句也没有。韩给你的三封信中，同样如此，只涉及联合：“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关于调解停止武斗，韩书只说“调解不欢而散，无果而终”，韩给你的信中只说“调解活动失败”，而具体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韩爱晶其实并没有和沈如槐当面谈过停止武斗问题？

韩给你的信中提到找周培源谈时，只说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此话似乎和武斗也沾不上边。也就是说，韩回忆与周培源的谈话，关于停止武斗的内容同样连一句也没有！很奇怪啊！

韩书中提到“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搞大联合。”如你所说，在当时武斗的大背景下，同时讨论这两类根本不同的问题是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的；韩爱晶的记忆在这里肯定出现了时空错乱。

我以为，韩爱晶记忆的时空错乱，可能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一件是1967年9月23日，韩等人到清华，谈的是清华两派大联合问题；另一件是1968年5月5日，韩等人希望找414谈停止武斗问题（即孙耘所说邱心伟书中记载的内容：1968年5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等负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前一件确有其事，谈了，而且414最终认可了老蒯的一把手地位；后一件，也可能确有其事，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而既未见面，当然更未谈。

不论谁要调解停止武斗，总是有具体内容吧，比如脱离接触（停止攻打对方）、收缴武斗工具、拆除工事、解除封锁等等；可是在韩书及韩给你的信中，对此没有提一个字！是他惜字如金？还是他忘记了？既然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怎么能忘记？韩爱晶牢牢记着自己出面去调解清华停止武斗而没有成功，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见到沈如槐！所以关于调解内容他才一句也写不出。

韩爱晶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欺骗他。韩书说，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商定，“组成调解武斗小组，首先去清华、北大找两派头头谈”；而邱心伟书中说是“北京

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组织者（北京市革委会）、工作对象（清华、北大两派头头）和工作内容（武斗调查或者调解）基本一致。

看来，在韩爱晶所说的1968年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的确组织了一个小组，任务是调解（或者调查）北大、清华两派的武斗，这个小组先去了北大，找了北大井冈山的周培源谈，然后又**想找**清华414的沈如槐谈，但“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结果**没能见面，当然就没有谈！**韩爱晶把此事和1967年9月23日谈大联合的事弄混了，所以，虽然他说“和沈如槐谈停止武斗”，但没有会谈地点，具体内容又只涉及大联合（1967年9月23日确实谈了所以记得），不涉及停止武斗（1968年5月5日没有谈成当然记不得）。

然而，韩书说此小组由三人组成：韩爱晶、王大宾和鲁文阁；而邱心伟书中说该小组由四人负责：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如按韩书，则小组中并无蒯大富，414没有拒绝的理由。但我们注意到，韩说找了北大周培源，没说是否找了聂元梓；又说找了清华沈如槐，没说是否找过蒯大富；既然是调解两派武斗，为什么只找受压的一派，不找“领袖”所在的一派谈？韩等三人不是在“拉偏架”吧？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所以才不用找他们谈；也因此，该小组被414拒绝。

当然，这只是推测，解开迷局需要翔实的史料佐证。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既然如此，他理应对所谈的具体内容和场景记忆更加深刻。我期待着韩爱晶进一步提供“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细节（包括具体时间、地点，他本人以及王大宾、鲁文阁对停止清华武斗的调解意见和要求等，最好有当时谈话的记录），以最终解开迷局。

（五）剿灭老四：这才是当年老蒯的真实思想

《流沙》说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但韩书中并没有对老蒯作这样的评述，不知是不是韩爱晶对老蒯的这种说法并不认同。

老蒯接着说：“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老蒯没有说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后“我”的反应。

我说过“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在前面列举老蒯指挥下的团派 1968 年 5 月份和 7 月份的“行”，已经揭穿了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虚伪。老蒯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和所谓“414 拒绝停止武斗”一样，都是迟来的“新闻”，都是 40 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这是老蒯在 40 年之后的“言”；而在当时，即 40 年之前，老蒯的“言”又是什么呢？请看：

1968 年 5 月 8 日，团派在明斋前召开了“彻底砸烂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第三次战斗大会，声称罗文李饶等六人小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等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是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对于四一四的反革命核心，那就是要坚决打倒。只要四一四不把罗征启交出来，不把陶森放出来，不把科学馆的工事拆除，团派的工事，一根长矛也不能丢掉。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摧毁四一四的反革命领导核心，夺取最后胜利”。（见 1968 年 5 月 10 日《井冈山》）

1968 年 6 月 23 日，团总部扩大会议通过了《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草案）》，其中说：“彻底摧毁清华 414 反革命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向 414 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阴谋集团宣战并且摧垮他们”，“这就是解决清华问题包括武斗问题唯一正确的途径。”（见 1968 年 6 月 28 日《井冈山》）

1968 年 7 月 15 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 414 向团派投降；(4)拆除 414 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

原来如此！当时的老蒯，的确是“巴不得”按这四条“停止武斗”！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老蒯的逻辑是，蒯四条表明了我老蒯“巴不得停止武斗”的“诚意”，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地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史料告诉我们，1968 年百日武斗期间，蒯大富和他的团总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对武斗毫无“后悔”之意，也没有一点“巴不得停止武斗”的意思；我们看到的是，团派不仅在行动上把武斗逐步升级，而且

在言论上也是逐步升级。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是“踏平科学馆，活捉罗征启，打倒沈如槐，解放全清华！”

事实证明，当年的蒯大富，对武斗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要的正是通过武斗剿灭414，实现老蒯的一统清华。这才是历史。老蒯所谓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的表白，完全是欺人之谈！

40多年过去了，看来，老蒯到现在仍然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在清华武斗的问题上力图为自己涂脂抹粉，闭口不谈团派少数打手对四派干部、学生惨无人道的暴行，甚至企图推卸制造7.27血案的责任，怪北京市事先“不打招呼”，并把具体责任推到任传钟头上！

（六）改写历史：韩爱晶的梦

韩爱晶说，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这大概是韩爱晶头脑中萦绕40余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他太想青史留名了！

韩爱晶说这件事是他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委屈，被谁耍弄；也许，他是为自己自告奋勇出面调解停止武斗但没有成功而感到委屈，为由于“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导致自己调解停止武斗失败而感觉被耍弄。不知韩爱晶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是被他的朋友蒯大富耍弄了！

既然是调解停止武斗，总要面对武斗双方吧？可是在韩书及韩给怒涛兄的信中，只说他们到清华找了沈如槐谈，找过蒯大富谈吗？没有提。大约可以肯定，没有找过。如果调解清华武斗而不找蒯大富谈，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所谓“调解”，就是纯粹的骗局，就是借“调解”之名压老四屈服。

假设，韩爱晶等人确实找蒯大富谈过，结果无非两种：老蒯拒绝停止武斗，或者老蒯同意按他的蒯四条停止武斗。而这两种结果，韩爱晶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即使为了在形式上保持调解的公平，韩爱晶等人也理应按市革委会的三条（我称之为谢三条）调解，但老蒯能接受吗？他要是能接受，还会有7.27惨案

吗？

1968年7月19日，《井冈山》发表社论，声称“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就是首先要坚决镇压沈罗反革命集团，谁要离开了这个主要矛盾，治末不治本，那他解决清华问题的任何措施都休想使清华运动前进半步。”

这就是老蒯对市革委会谢三条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回答。所以，韩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失败，既不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也不是因为“吴德不认真落实”，更不是因为老蒯捏造的“414拒绝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蒯大富不剿灭414誓不罢休。韩爱晶自诩“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请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怒涛兄，你在给韩爱晶的信中，称赞韩爱晶**政治智慧超群**，可是在清华武斗和7.27血案的问题上，韩爱晶的政治智慧并不比老蒯高多少。40年后的今天，韩爱晶仍然相信“清华内在矛盾本应该也能够和平解决”，我真不知道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调解能力，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老蒯“和平解决”的意愿。对于7.27血案，蒯、韩、聂等人都把北京市革委会事先“不打招呼”作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原因，这就更加明显是为蒯大富开脱了。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难道不是“招呼”？7月13日和7月15日，市革委会领导两次接见老蒯提出谢三条，难道不是招呼？事先也没有人给414“打招呼”，414为什么没有打工宣队，反而敞开大门、和工宣队一起拆除工事？究竟谁“巴不得停止武斗”，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

老蒯自己也说，当时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看到鲁文阁就在楼下，旁边的女工还穿着裙子”，“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即使如此，老蒯仍然以上柴联司的下场来恐吓部下，团派仍然对工人下了毒手！有人来制止武斗而没有“打招呼”，我就对制止武斗的人下毒手，这恰恰说明，蒯大富根本不把中央和市革委会放在眼里，根本不愿停止剿灭414的武斗，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意愿。韩爱晶竟然看不到（或者有意遮掩）这一点，还有什么**政治智慧**？

所以，韩爱晶等人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活动注定要失败，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他相信能“和平解决”，而现实（老蒯的实际作为）却残酷地**耍弄**了他！退一万步说，就算调解成功，蒯大富愿意放下剿灭414的屠刀，也改变不了红卫兵

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个历史的大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七）今日老蒯：镇压老四仍然有理？

《流沙》在对当年的武斗进行忏悔时说：“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然而，对于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老蒯竟然说什么“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

好一个“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40年前老蒯加在414头上的罪名，而且至今老蒯竟还是这样评价老四！理由就是，414的核心人物和一些干部，曾私下议论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并且他老蒯“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不是有意陷害”。

我要说，对老蒯扣给老四的这顶帽子，不仅当时我们“不认账，不承认”，就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今天，我们也“不认账，不承认”。毛主席是当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发自肺腑的誓言。当年说我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对414的污蔑，是为剿灭414找借口；但到现在还说414当年“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则是为了证明当年武斗剿灭414有理，镇压414有理！老蒯大约忘记了，团核心包括蒯本人“私下议论”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团派整理过几乎每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黑材料，还公开炮打过周总理、康生，又该戴什么帽子？还要提醒老蒯，你那些“强有力的证据”是怎样取得的？是靠钢丝钳拔牙取得的，是靠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取得的，你还好意思说“不是有意陷害”！

（八）可以结论了。顺便“辟谣”。

我在修改本文的过程中，看到怒涛兄在《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里引用了陈育延的日记和陈育延的信。陈育延的信为我本文的观点提供了意外的佐证，也使我有可能提前得出并不意外的结论。

陈育延在6月10日给你的信中说：邱心伟《大事日志》第344-345页中关于5月5日《市委调查组》的一段，不是取自沈如槐的《文革纪事》，而应当是取自唐少杰的《一叶知秋》第16页上，言词完全一致。而唐少杰的这段，又来自蒯大富、韩爱晶的口述。我曾求教唐少杰老师这段记载的来源，唐老师答应查一查但尚未回复，如果按陈育延所说，来源于蒯、韩的口述，证明邱心伟书中此段确有其事。然而，陈育延没有说，这段话中“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是否也来自蒯韩的口述？如果也是蒯韩口述，岂不证明韩与沈如槐没有见面吗？

更有意思的是，陈育延的《有感》（可不是周家琮的那篇《有感》）中担心怒涛兄的《追寻记》“一步步引导韩爱晶犯错误”，于是，当他(按指孙怒涛)写到第十二集时，我便着了急，我想帮助韩爱晶，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继续查资料。没想到，还真查到了68年5月4日的工作笔记上有一段。

5.4 市革委会讨论结果：

1、讨论地质东方红小报上关于大事记的问题。①此大事记是反动的。②

2、蒯要求谢付总理处理我校问题，谢说处理不了。

3、组成调查组。刘绍文组长，蒯、聂、韩、王（大宾）、谭组成（王、谭反对）。

[摘自1968年5月4日工作笔记]

这段陈育延当时的笔记，恰恰证明了我在前面《韩爱晶“调解停止清华武斗”的迷局》中的三个推断：①1968年5月初，北京市革委会确实组织了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②聂元梓、蒯大富身处该小组之内；③所以414拒绝该调查组，韩等人未能见到沈如槐，当然就没有谈！陈育延的这段笔记，也至少说明了韩爱晶记忆的两个错误：①不是武斗“调解组”而是“调查组”；②参加人是邱心伟书中所说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而不是韩书所说的韩爱晶、鲁文阁、王大宾三人。

我不去追究“调解”和“调查”的内容和目的有何不同（但这种不同是显然存在的），我只想说，如果蒯大富参加韩所说的“调解”，以韩爱晶的政治智慧，难道认为武斗当事人也可以担任武斗调解人吗？

陈育延以这段笔记调侃怒涛兄说：这回孙怒涛可能真的是“他妈的，又打偏

了！”本想打韩爱晶的，现在却伤到沈如槐了！依我看来，很可能是育延学妹“打偏了”，本想帮韩爱晶的，现在却帮了沈如槐！

陈育延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来清华调解过武斗，找到沈如槐，但未谈成。

我的结论是，1968年5月初，市革委组织了武斗调查组，意在制止武斗。韩爱晶、王大宾等试图来清华找414调解武斗，但因调查组中有蒯大富，被414认为不公平而拒绝；韩爱晶等没有见到沈如槐，未谈成。

顺便提一句，育延学妹很坦率，日记也很生动，但当时的日记也难免片面性吧！

在摘引了9月24日工作笔记后，陈育延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从9月21日下午到今天又进行了四次谈判会，毫无进展！今天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谈判会（聂元梓中途退场）。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414这种极端无赖的态度所激怒，王大宾说：“414太滑头了！”（声音很大），韩爱晶干脆站起来拍桌子大骂，414在很尴尬的情况下拒不签字退出了会场，真是一幕政治斗争中的滑稽戏，岂有此理！

陈育延没有写414拒不签字的原因。实际上，如她所记录的，王大宾发言“蒯第一把手，底下一边六人”，414是同意的了。

此事韩书中也有记载（P. 316）。“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看起来，“极端无赖”的是团派，他们推翻了初步达成的协议，又提出团派9人，四派4人，414才拒不签字的。414并不是像陈育延所说“很尴尬”，而是如韩爱晶书所说“十分气愤”地退出会场的。说“岂有此理”的应当是414啊！

我不讳言，韩书确有许多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史实，也有许多相当深刻的见解；《流沙》同样有很多观点是我也认同的。不过“求同”并不妨碍“存异”，也不妨碍“质疑”。如果说已经逝去的历史是一头大象，我们在探寻它的时候就要力求避免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局；我们必然会有局限性，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

应当力求忠于事实，力求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我的态度。

祝好！

陈楚三

2011.5.17初稿

2011.5.20修改

2011.6.23补充

附录：韩爱晶的三封邮件（已征得孙怒涛同意）

孙怒涛：你好。

- 1、调解武斗的事，我会当件事认真对待。我已钻进另一个题目资料之中。
 - 2、如果有人能查阅北京市革委会记录就会一目了然。
 - 3、包括当时去北大调解，有条件时我也会同时求证。
 - 4、文革中我去北大清华先后找周培源、沈如槐直接为北大清华停止武斗搞大联合进行对话都只有一次。
 - 5、414当时也并非沈如槐一个人。
 - 6、我们是坐下来，面对面对话的，开头还很客气，后来沈如槐愤怒指出：蒯是蒯匪！怎么能与他联合并承认他是一把手！
 - 7、沈的态度不是外交手法拖死蒯，而是脱口而出的真情真言。
 - 8、他的认识与我当时思想认识距离太大。王大宾也认为联合之后承认蒯为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也大声对沈如槐。不欢而散。
- 沈如槐一开口，苏北味，当时我惊讶我、蒯、沈三人是老乡！
- 9、原来我一直没有反对过老四，直到1968年7月，有一天，在体院养病时听到老四广播台在骂：蒯大富、韩爱晶之流……我火冒三丈说：我又没对你老四怎么样，还特别在大会上强调，只要不参加武斗的，一视同仁好好接待。
- 听此广播，我当即打电话回北航，广播把414的轰走。可见年轻感情用事。
- 10、快半个世纪的细节各有所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辅相成、相反相生！

保重！

韩爱晶

2011, 05, 06

孙怒涛：你好。

我确认1968年去清华调解武斗并见沈如槐是真实的。

我所述参与者包括沈如槐记不起或否认可以作为疑点。

这件事从市革会开会……红代会工代会沟通……两派参与……先去北大见过周培源，很客气，戴助听器，以井冈山负责人身份谈井冈山才是造反派……去清华见沈如槐不欢而散……调解活动失败……有被耍弄的感觉……后来在多种场合谈此事……甚至多次表示如果当年市革会认真对待我的建议不会有七二七……写书搜集资料，从邱心伟大事记中只见到一句……详见邱书中李钟奇多次调解，才明白干部、军官们对我建议不积极的原因。

这件事对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不在意的事，他们忘却不奇怪。这件事是我的一个特殊心结和委屈，后来与蒯也多次谈起。确实、确实，我相信会有确凿历史证据来说明。

至于你问：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是不是只见过沈如槐一次？你唯一见到沈如槐的那次，是不是就是你在《清华蒯大富》P339中所写的那次？

我在书中引过一句话：说有易，说无难。

从1967/01/01到1968/07/27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别的场合如果与沈如槐见面机会也不少，比如1967年8月5号在天安门上，他书中写向总理问问题，那个问题是我问的。

我说一次，是指文革中重大政治交往。

保重！

老韩

2011, 05, 08

孙耘、孙怒涛：你们好。

1、 调解武斗，确有其事，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有关会议记录解密会确凿证明这一点。应该是1968年，邱心伟大事记上提过一句。

2、我们去北大、清华调解武斗，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

3、其后几十年里，我多次在各种场合为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4、如果当年调解武斗成功，就没有七二七流血，没有七二八召见，甚至没有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历史就要改写。

5、2010年蒯大富、李自茂等去四川，王大宾也证明有此事。

6、过去近半个世纪，细节要考证很正常。

7、孙怒涛总要用一个什么公式来推论历史事实，似不可取。

谢谢！

老韩

2011, 05, 18

【蓦然回首】

在文革中当测绘兵

杜康隆

1967年国庆以后到年底，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在重庆沙区公园为武斗中的死难校友修墓的工程。我们重庆二十中“八一五战斗团”，在当年的那一场腥风血雨的武斗中，先后被打死了8个同学，有7个同学埋在沙区公园。

正在那时，当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刚刚结束，而川南泸州地区的武斗却还打得很凶，不得已，在泸州招兵的部队纷纷转向重庆，所以招收的兵种很多，有陆军、高炮（招收的兵后来参加了援越抗美）、测绘部队和海军。因为在武斗中没有留下枪伤，我和何天模同学都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测绘兵。

半山兄弟

我所在的昆字一一九部队，实际上是由昆明军区代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十六测绘大队。部队驻防在云南省玉溪县境内，位于玉溪“坝子”（云南话：群山中的小平原）最北边的青龙山脚下。这里的风景很美，天晴时，站在营区的制高点上，可以俯瞰玉溪坝子郁郁葱葱的田园春色和眺望远处的山岭风光。

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有两个来自重庆九龙坡区半山公社的农村青年和我分在同一个新兵班里。两个半山兄弟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大家都喜欢叫他们“大半山”和“小半山”。我们班的班长是四川省隆昌县的肖姓人氏。肖班长生就一张笑和尚的脸面，他对人和善，爱讲笑话，但是搞起训练来严格要求，决不马虎。我们既喜欢他又畏惧他。两个半山兄弟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吃肉很馋，开玩笑不花本钱，抽烟很凶，只要你白给他们一支香烟，就可以让他俩高兴得在地上打个倒立。新兵连的伙食，那是好得不用说了。各个测绘中队都先后送来了自己喂养的大肥猪，打个牙祭改善伙食，那是常有的事。每次吃肉他俩都是狼吞虎咽的，端着自个的饭碗，盯着厨房里的菜盆，希望添加点残汤剩水。半山兄弟俩只要一有空，就会立即掏出自制的叶子烟杆，眯起眼睛猛吸几口，像哼哈二将一样吞云吐雾，搞得班里乌烟瘴气的。我们提意见，让他俩到屋外去抽，他俩非但不接受，还反唇相讥。大半山说：“男人不抽烟，枉活在人间！”小半山道：“你们以为抽叶子烟容易嗦？拿给你抽，你都整不醒豁。听到起，抽叶子烟有诀窍……”我们假装不感兴趣的样子，急得两个半山抢着说道：“一要烟杆通，二要裹得松，三要明火点，四要巴（吸）得凶。”边说边做示范，让我们这些不抽烟的人哭笑不得。

新兵连训练的主要内容无非是：政治学习、军容风纪、内务条例、队列训练。最令人头痛的就是队列训练，枯燥乏味，时间又长，一练就是半天，经常练得腰酸背痛的。好在我们几个学生兵都有一定的基础，因为练得好，肖班长经常放我们的假，让我们坐在一旁观看。半山兄弟俩就不同了，别看他们平时嘴巴厉害，下起操来经常是左右不分，有时还背着班长故意一瘸一拐的，样子十分搞笑。肖班长不得不经常给他俩“开小灶”。他俩不以为耻，反而打趣说：“下洋操我们认输，吃肉哪个敢来比？”他们这种态度，肯定见不到成效，半个多月都没得长进，肖班长着急了。

一天，操练中途休息，肖班长开腔了：“我们先猜个谜语，然后再讲个故事，要不要得？”全班都围了拢来。肖班长放慢速度说：“当兵三年，都不会立正稍息——打一个城市的名字。”

两个“半山兄弟”的脸开始红了。想了一会，有人猜：“哈尔滨？”“对头，傻儿兵！”（川语将“傻”读作“哈”）肖班长点了点头。接着说，今天就讲个“傻儿兵”的故事：“解放前，四川有个军阀叫刘湘，有一次，他到下面去巡视他的‘双枪兵’部队。这些双枪兵打了胜仗就能奖赏到大烟土，因此，作战时都十分玩命，但是队列操练不行。检阅的那天，队伍歪歪扭扭，七零八落的，刘湘觉得很没面子。临走时甩下狠话：‘一个月后我再来，要是再走不整齐的话，老子要重罚！’”

“遭罚没得？”有人急不可待地问班长，还顺便瞄了那两个“半山兄弟”一眼。肖班长接着说：“这支部队的长官着急了，还是师爷的鬼点子多，师爷分析说：我们部队的队列操练不整齐，主要是士兵们左右不分。如果把每个人的左脚穿上布鞋，右脚穿上草鞋，就分得清了噻！长官欣喜若狂，命令马上采纳。从此，操场上不时传来：‘齐步——走！布鞋、草鞋，布鞋、草鞋，左、右、左’的口令声。”

“左、右、左，西药瓶子牙膏皮子左（换）洋火！你抽烟，我点火，烧到你的鼻子莫怪我！”两个半山兄弟接过话题念起当年的童谣唱反调。“莫插嘴！听到起！”肖班长加重语气说：“师爷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个月以后，这支部队就顺利地通过了刘湘的检阅。”然后眼睛盯着两个“半山”说：“连国民党的傻儿兵都转正了，难道我们解放军还比不上他们？”最后一句话，逗得全班轰堂大笑。笑得最凶的还是那两个半山兄弟。

你还别说，从那以后，半山兄弟俩像换了个人似的，在“左右左”的口令声中，虽然步伐仍有点僵硬，但他们的队列操练进步多了。有战友分析说，可能是得益于他两个在心里默念着布鞋草鞋的原因吧？

翻越折多山意外会校友

1968年5月，部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州政府的所在地就是著名的康定

城。“康定”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洁白而美丽的地方。这时的康定城和内地的乡镇街区差不多大。穿城而过的雅拉河和折多河汇流成了康定河。康定河水清澈而湍急，带着西部地区大自然未被污染的原始韵味，急不可待地向东流向大渡河。部队到达康定城，已是夕阳西下时分。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古老小镇的藏式建筑上，金光闪闪，藏式建筑风格和周围的群山浑然一体。傍晚，天色骤变，空中慢慢地飘起了鹅毛大雪。部队宿营在这座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山城外的军供站里，一路的所见所闻，让人难以入眠。

次日一大早，部队继续向西行军。雪，越下越大。康定城南的跑马山上白茫茫的一片。红军长征时翻越的夹金山（大渡河的东岸）和我们将要翻越的折多山，分别矗立在大渡河的两岸，两座山脉都成南北走向。折多山的南面不远处（大约离川藏公路直线七八十公里），就是海拔七千五百多米，常年积雪不化的贡嘎山主峰。上山的大道奇卡车的车轮套着防滑链，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运输队，像一条长长的巨龙盘绕在折多山的山腰上，艰难地向山顶慢慢地蠕动着。大雪使能见度越来越低。偏北风呼呼地夹着雪花在空中狂舞。那时的川藏公路，路基极不稳固。一路上，我们看见有好几辆地方进藏的解放牌载重卡车，斜着车身滑倒在山崖壁上，进退两难，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大雪未停，我们很难施救，不然自身难保，只有继续前行。

常言说道：上山容易下山难。而汽车在大雪中下山，更是难上加难。汽车三步一停，两步一滑。虽然汽车运输十七团的司机都是些跑川藏公路的老手，但是路面太陡，有时刹车稍重一点，车轮就打着滑梭向路边，把铲雪的修路工人吓得飞快地逃跑。大家坐在车上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想不到西康地区的天气是这样独特，越往山下走，雪就越来越小。来到折多山的山脚，太阳出来了，眼前呈现出草肥牛羊壮的美妙景象，让人称奇不已。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车队开进了新都桥军供站。新都桥是汽车进藏的南线和北线的分路口。南线经过理塘县和巴塘县，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南地区（进藏后的路十分艰险，经常发生泥石流，出藏时我们走过）；北线经过道孚、炉霍、甘孜等县，到拉萨的路程虽然较远，比南线好走。

吃过晚饭，我们在军供站周围到处闲逛。由于进出西藏的部队和家属特别多，此处人来人往，像赶庙会一样。很多老兵和新兵都在抓紧时间“打望”。不经意

间，一个身影熟悉的军人站到我的面前：“认不到了嗦？我是高一×班的×××。”

“吔！你不是体检合格了又不想当兵的吗？怎么又来了呢？”我惊喜地发问。

从他的一番解释中，我才慢慢了解到：中央决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文件精神，已经在军内的高级干部中传达。他是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干部的子弟，得此信息，所以才急急忙忙当兵来了，分到了新都桥兵站。听他侥幸躲过下乡的口气，当时我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知道。我只是在想：我的弟弟妹妹们、校友们，特别是那些在文革武斗中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同学们，又该如何去面对这一下乡运动呢？

金珠玛米，牙摸牙摸

“牙摸”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好”。“牙摸牙摸”自然就是“很好”！“金珠玛米牙摸，牙摸”是一位藏族老阿爸对我们这些解放军战士的赞美之词。

1968年7月，我们小组的控制点测绘工作，进展到关键阶段。简而言之，航摄（飞机拍摄的照片交给航摄测绘大队到野外实地测绘）测绘的野外作业工作，分为“调绘”（实地调查绘制草图）和“控制”两大部分。所谓控制，就是地图的控制点（提供给内业绘图标注高程和画等高线时使用）。控制点的测量工作十分重要。这项工作，必须在现场用经纬仪器的观测数据，来求证出（未知的）控制点的准确“坐标”和“高程”。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在实地找到已知的大地点、军控点。大地点和军控点，一般都设置在视野开阔的高山顶上。它们的显著标志，就是矗立在山顶之上，供观测用的三角形标笼。日久天长，风吹雨打，很多三角形标笼都倒塌了。（右图：战友们身后即大地点三角形标笼。）

要想获得观测数据，就必须在这些已知点的中心，用竹杆竖立一面红白相间的观测旗子。插旗工作，在西藏恶劣气候条件下



十分危险。国家测绘总局的大地点测绘队和部队的军控点测绘队，在西藏作业期间，有过多次血的教训，遭遇过雪崩、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牺牲的同行不在少数。有时，一个小组的七八个人同时都被深埋在雪中。我们小组在控制点的测绘中，就遇到三角形标笼倒塌的困境。大山区作业，可供选择的控制点少之又少，观测求证每一个点，都十分重要。小组领导决定：就是克服千难万险，哪怕流血牺牲也必须上山插旗。那时，我还是个新兵娃儿，登上山顶插旗的艰巨任务还落不到我的头上，我只能随行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上山插旗的那天，天刚朦朦亮，小组就兵分两路：一个技术组长带着经纬仪器去爬控制点（控制点要比大地点矮一些），准备观测。两个精通控制点业务的老兵，带着我和另一个云南籍的新兵就出发去插旗子。我们爬到半山腰的一条不足十米宽的小河边，搭好帐篷，两个老兵嘱咐了我俩一番，就消失在登顶的路上。

中午，我俩吃完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喝了几口凉水，砍了一些较干的树枝，准备做晚饭用，为了打发剩余的时间，就钻进帐篷谈天说地了。

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帐篷顶上，热气逼人，让战友放哨，我想小睡一会，但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我正想出去遛达一下，云南老乡用食指竖在嘴巴上，示意我不要说话。他轻轻掀开门帘的一角，我们看见七八只野兔子在帐篷外不远的地方吃草，有两只野兔已窜到帐篷跟前，吃我俩掉在地下的压缩饼干碎末。听到有响动就一溜烟地跑了。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我对云南老乡说：“两个老兵太辛苦了，打几只野兔，慰劳慰劳，给他俩一个惊喜！”“没有带猎枪，拿哪样打？”他无可奈何地说。我这才想起，小组配发来打猎用的英式步枪（中印边界反击战缴获的），因出发时走得急，忘了带——不能用我们随身装备的子弹打猎，这是部队的死命令，否则，一旦发生敌情怎么办？

我正在垂头丧气。“用棒棒打！”他眉飞色舞地说。我俩赶忙用压缩饼干设置诱饵，同时，找了一些粗大的柴块当武器，放到帐篷里的顺手处，就欢欢喜喜地“守株待兔”了。天不遂人愿，久等都等不来，倒是把我的瞌睡等来了。迷迷糊糊中，他碰了我一下。睁开眼睛侧身子往帐篷外一看，我高兴得两眼放光，我俩相互示意：各自拿了一根一尺来长的树棒棒，用脑壳点数：“一、二、三！”猛地一掀门帘，同时大打出手，树棒棒飞到之处，两只兔子在草地上挣扎，还有两只兔子一瘸一拐，发出哀叫的声音，其余的四散跑开了。我冲出帐篷按住那两只挣

扎的野兔，云南老乡却不知道追哪只受伤的野兔好，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结果野兔全都钻进了兔子洞里。他不死心，傻呼呼地在洞口前守候了好一阵，才回来对我说：“用水把它们灌出来！”我俩忙碌了好久，灌进去的水从好几个较低的洞口流了出来，堵都堵不住，没办法！

我们把战利品收拾得干干净净，该烧烤的烧烤，该炖汤的炖汤。我高兴得一边忙活着，一边自编自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根棒棒消灭一只兔子，我们都是测绘兵，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清清的小河边，早已经安排好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顶上，还有我们的好兄弟……”嘹亮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我殷切地希望那两个老兵能够听到歌声早点回来，希望他俩都平安无事。

活忙完了，歌也唱累了，天就要黑了，还是不见那两个老兵的身影。我们两个新兵蛋子既担心又害怕。因为年轻，疲倦了，也忘了站岗，怀抱着冲锋枪，我俩靠在帐篷边上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嚓、嚓、嚓”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把我俩从梦中惊醒。睁开眼睛一看：黑灯瞎火中，一个身形高大的藏族男同胞近在咫尺！慌乱之中，我俩同时举起了冲锋枪：“不准动！”他吓得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我们向四周一看，没有其它动静，这才放下心来。借着快要熄灭的篝火光亮，看清眼前站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藏族老阿爸。他又说又比划，还不停地用手指着高压锅边放盐巴的小铝盒，接着又指着自己的脖子。原来，老阿爸的脖子上吊着一个很大的甲状腺瘤子。明白了：西藏地区一般吃的都是岩盐，岩盐不含碘，大山区的藏族老乡还经常缺盐吃。

我俩把一满盒盐巴几乎都倒给了老阿爸。老阿爸撩起“楚巴”的前襟包裹着，面向着我俩往后退着走，不停地点头哈腰，一边退一边叨念着：“金珠玛米，牙摸，牙摸！”他用生硬的汉语，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直到消失在夜色之中。

大约晚上10点多钟，太饿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打着兔香味的饱嗝，瞌睡虫就来到了身边，撵都撵不走。于是，一人站岗，一人睡觉，就这样不停地轮换着，等待着胜利归来的战友。天快亮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雾气茫茫的晨曦之中，只见两个老兵一前一后，眯着双眼，迈着沉重的步伐，刚刚走到帐篷边上，就地一滚，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不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我俩连忙把雨衣垫在他们的身下，看着热气腾腾的兔子汤，也不忍心打搅他俩的美梦。

莱阳军营的枪声

1969年初春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使国际国内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在突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备战的大背景下，这年下半年，我们测绘大队接到了开赴山东烟台地区执行紧急战备测绘任务的命令。顺利完成烟台地区的测绘任务后，按照上级的指示，部队就近驻防在位于胶东半岛腹地的莱阳军营，集结待命。莱阳军营就在莱阳城郊。初冬的莱阳（当时还是县）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10度左右。漫山遍野，莽莽苍苍。我生平第一次在北方过冬。

天寒地冻的莱阳军营，当时还没有暖气设备。在军营里过冬，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白天，生炉取暖，满屋乌烟瘴气，令人窒息。一到天黑就必须吹灯熄火，防止煤气中毒，怕冷的战友们还要戴着毛皮帽子睡觉。一早醒来，帽子滚落得遍铺遍地都是，寒冷的空气使每个人的胡须上，眉毛上，头发上都冻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用手刨来扳去，就是扳不掉。起床的时候，大家相互观赏一副副白毛大仙的嘴脸，十分搞笑。

在莱阳军营待命期间，正值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阶段。部队的总结、评比、表彰活动，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对个人工作成绩的评估和认可，战友们都十分重视。这次评比表彰，对1969年初刚从偏僻的贵州省荔波县入伍的少数民族战士来说，更为看重，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一般说来，不可能提拔为业务战士或者技术干部。他们认为，评上“五好战士”是通向士官（司务员、司务长和排长）的唯一途径。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过分地看重个人的荣誉和前途，在总结评比的最后阶段，就闹出了大事情。

严冬的一天深夜，训练了一天的战友们早已入睡，能够容纳一个连队的大营房里，寂静得连掉一根针的动静都能听得见。这时，一个在野外作业中表现比较突出的荔波战士，因为名额有限没有被评上五好战士，认为是他们小组的组长从中作梗，耽误了他的前程，实在是想不通，半夜三更起身，就端着冲锋枪，小声地勒令他的技术组长坐起身来，准备结果组长的性命。组长肯定要装傻，当然不会起来就范。而那战士又怕误伤别人（也可能是思想斗争激烈，一时下不了决心），总之，迟迟未勾动枪机。他的呵令声和极不正常的举动，惊醒了旁边的一位战友，他悄悄起身摸到持枪者的身后，抱住其双手用力地向上一抬，枪声响了：“咚咚

咚咚”冲锋枪射出的子弹，从那个组长的枕头边一直扫射到墙上。又有好几个战友同时起身奋力地夺过冲锋枪，将罪犯按倒在地。

枪声划破夜空，惊醒了整个中队的战友。

无话可说，只要枪声一响，性质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冲动犯罪一样被摘掉帽徽领章，五花大绑。开完全测绘大队批斗大会的当天，这个荔波兵就被押解回昆明军区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终审为杀人未遂罪，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

后来，我们在完成内蒙古地区的测绘任务后回到云南玉溪营房，从留守营房的战友那里得知：那个荔波兵在坐牢期间，一直喊冤不止，拒不认罪，导致精神错乱，最后在越狱逃跑中被狱警开枪击毙。

云南大地震轶闻

1970年的国庆节前夕，我们胜利完成了山东和内蒙古地区的战备测绘任务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云南玉溪军营。在我们的心目中，驻地和军营已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再次回到它的怀抱，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温馨。

久别“故乡”产生的依恋之情，使我们更加热爱那一片热土。闲暇时，我们逛遍了军营的大小角落。心细的战友发现营房的很多地方有被修补过的痕迹，而且开启门窗时，别别扭扭，十分困难。询问留守的战友，得知年初时云南曾发生过大地震，我们无不骇然心跳，同时有一种被首长们封锁消息，被人愚弄的强烈感受。

留守的战友在描述大地震的惨况时，仍然心有余悸。留守的战友说，就在那年之初1月4日的晚上，欢庆新年的喜悦气氛仍然笼罩着滇南大地，但是，深冬的寒意催促着人们早早地就进入了梦乡。5日凌晨1点钟左右，一声雷鸣般的巨大响声后，山摇地动，惊醒了营房中熟睡的战友。眨眼之间，门窗噼噼啪啪，轰轰轰地响成一片。当时，鉴于紧张的中苏关系，军人的直觉告诉他们：战争爆发了！慌忙之中穿好衣裤，纽扣都来不及扣好，跌跌撞撞，在黑暗中好不容易才摸到冲锋枪，却怎么也打不开门窗。地面又剧烈地摇晃起来，情急中只能用枪托砸开窗户，跳到屋外，有的战友立即摔倒在地，爬不起身来。晃动的大地不时发出低沉

的轰鸣声。

未见明显的爆炸火光，战友们怀疑是地震，又不能确定，焦急的等待中，大队部从无线电报话机中终于接到了昆明军区作战部的命令。命令说，玉溪南面的通海县和峨山县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已经波及到建水、华宁和玉溪县境内。得知玉溪营房受灾不重后，命令强调，要最大限度地抽调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要逐步向南搜查，就近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玉溪坝子的南部边沿，离地震中心的通海县不足 50 公里。救灾的战友顺着滇南公路南下，当他们赶到小街（地名，在玉溪坝子最南面）一带时，在寒气逼人，朦朦胧胧的夜色中，发现公路边上有一群衣着不整的村民，正在烤火取暖。看到亲人解放军，无不潸然泪下。一个幸免遇难的老人，伸出血肉模糊的双手，仰天长叹：“亲人啦！全村的房子都倒塌得差不多了，就剩下我们这十多个人，我们刨了半天，一个活人都冇（没）有见着的嘛，咋个整嘞！该死的美帝国主义！应该千刀万剐呀！”他们以为是帝国主义的轰炸。因为这一带有不少“抗美援朝”的军烈属。

参加抗灾的战友来不及解释，另一个老乡就接着问：“阿母母！这么大的阵仗，该是美帝国主义丢下的原子弹？咋个整我们平头老百姓的嘛，杂种！歹毒的嘛！”还没解释清楚，离此地不远，受灾不很严重的村子的村党支部书记闻讯沿着公路赶来，人还没有站稳当，劈头就问：“该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了嘛，咋个？我把村里的基干民兵都带来了，一切听从解放军同志的指挥。”战友们终于把发生地震的情况解释清楚了。于是，劝民兵们赶回本村去进行自救工作。

参加抗震救灾的战友们迅速散开，一场战天斗地的救援工作就开始了。为避免对深埋的灾民造成二次伤害，战友们只能用双手搬、刨的方法去寻找幸存者。不一会就刨得双手鲜血直流。天就要亮了，惨不忍睹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战友们眼前。在幸存者的辨认下，整家整家的老乡被埋在一片废墟之中，其中，还有襁褓中的婴儿。奇怪的是，幸存者中有不少是睡得较晚的老人。抢救出来的重伤者都被及时送往附近的卫生院和医院，轻伤的人嚎啕大哭，死都不愿离开亲人遇难的地方。从昆明南下救灾的大部队纷至沓来，抗震救灾工作没日没夜地进行了一个多星期。

企图偷越国界的人

翻开中国的地图册，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有一条纵跨南北，日夜奔腾在崇山峻岭中的怒江。这条跨越西藏和云南两省，以“怒”为名的江，汹涌澎湃，名副其实。咆哮如雷的江水，势如刀劈斧砍，把滇西大地劈成两半，形成了世界上最长、最神秘、最壮丽、最奇险，最原始、最古朴的怒江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全长一千多公里，平均谷深达二千米以上，两岸的太子雪山、梅里雪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海拔都在五六千米以上，巍峨雄壮，耸入云霄。

1971年的春节刚过不久，部队就接到去滇西的泸水、腾冲、保山一带执行测绘任务的命令。我们测绘小组被安排在怒江大峡谷南端的福贡县和泸水县境内。泸水县城坐落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怒江边上。该县东靠碧罗雪山，南接保山市的腾冲县，北连福贡县，西与缅甸联邦共和国毗邻，国界线长一百三十多公里。这片神秘的土地，居住着汉、白、景颇、傈僳等二十一个民族。听说那里的汉族人中，绝大多数是历史上中原的汉族王朝被元朝、清朝推翻后，汉民逃难迁移到边疆的，其中当然也有解放战争时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后，落荒而逃的国民党李弥将军的残部。我在当地执行任务期间，曾经多次碰到过这些残部以及他们同当地少数民族通婚生育的后代。泸水县境内的地势北高南低，幽深的峡谷成为陡峭的“V”字形，这一带的海拔落差平均在三千米以上。独特的地形和较低的纬度（北纬二十五度左右），使其具有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山顶白雪皑皑，谷底春夏常在。从谷底到山顶可分为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七个气候带。这里不能不说是一处气候奇观。

那时的文革之风波及到全国各地，在这个西南边陲上的小县城，也能感受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浓浓的文革气息。当时这里军民共建“政治边防”的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对于视为阶级异己的“黑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殃及到他们的子女，“黑帮”子女们企图偷越国界线的事件，时有发生。部队进入测区后，我们在了解当地情况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要求我们要提高警惕！因为，从地图上看，泸水县的片马镇离中缅国界线很近，有的偷渡者到泸水县的六库镇以后，才发现过不了怒江。有的偷渡者冒险涉水，全都溺水身亡，葬身鱼腹。

我所在小组的测区，就在六库和片马一带。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长把小组的住地安排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六库镇。六库镇位于怒江东岸，一条逆江而上的公路从该镇的中心穿过；紧贴六库镇而过的怒江水吼声震天，初来乍到的人肯定晚上睡不好觉。六库镇的上游三公里处，有一座钢索公路大桥，一旦有汽车通过，桥面就会上下起伏，所以每次只能通过一辆汽车。那里有一个排的边防军战士日日夜夜地守卫在大桥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

因为测绘任务的需要，我们不时地来回穿行在怒江的公路大桥上，所以，同守护大桥的边防战士十分熟悉。他们中的大多数战士都是当地的人，对那里的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只要是他们不认识的人，如果没有证件，休想蒙混过关。

一天傍晚，我们从高黎贡山下来，通过大桥来到怒江东岸，在赶回六库镇的路途中，发现公路上有两个外地模样的行人，一前一后，一女一男，躲躲闪闪，行迹可疑。那女子头上裹着一条花绒头巾，只露出一双暗淡无光的大眼睛；那男人大约二十多岁，看见我们后，便背向公路蹲在路边，不停地抽烟，右手插入怀中，好像握着什么东西一样。我们不敢打草惊蛇，没有询问，就快步回到镇里，将这一可疑情况汇报给了六库公社武装部的工作人员。

大峡谷的阳光照射时间十分短暂，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急急忙忙地出发了。可以想象那两个外地人的处境：左有汹涌澎湃的怒江，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只剩下唯一的出路——逃向右边碧罗雪山山脚的密林之中。那一晚，怒江东岸陡峭的山岭上，火把通明，犹如繁星点点，搜寻人的呵令声，在怒江水的咆哮声中，时隐时闻，通宵达旦。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准备出发去完成当天预定的任务，公社的民兵队长前来通报情况。他说那两个企图偷越国界线的人已经被抓回六库镇。经过初步审问，他俩承认是湖南人，是老干部的子女。同时强调，他们偷越国界线的目的，是想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去当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是叛逃！听到这里，我的确替他俩感到惋惜。因为，我们早就从守桥的边防战士那里听说过，六库镇南面的腾冲县，有不少的回乡知青，跑到缅甸去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当地的人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支持也不反对。选错路线，一旦被抓住，就算他俩强调的是真话，恐怕也难以辨白清楚，“叛逃”的罪名肯定难逃！

谁是“蒋残匪”

在缅甸联邦共和国东北地区，有一个十多万汉族人集居的果敢县。果敢县的东边与云南省的临沧、保山地区接壤。根据野史传闻：果敢县的来历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清军进入山海关以后，大量的明军残余携带着家眷和中原的老百姓，逃到了云南省西部保山地区的腾冲和临沧一带定居。后来，又在平西王吴三桂的追剿下，被迫越过中缅边界，迁居到缅甸的果敢县境内。历史似乎有意地要重复这一民族迁移的过程。到了国内解放战争的反攻阶段，国民党政权溃败到台湾，来不及撤走的国民党军李弥将军（腾冲县人）的残部也溃退到保山腾冲一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和清剿中，这些国民党的残部同样越过边界，进入了果敢地区。听老乡讲，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曾把逃到果敢的李弥残部作为反攻大陆的先遣军，并多次向其空投给养和军用物资。反攻大陆虽然是一场闹剧而已，但是却增强了果敢地区残兵败将抵抗缅甸政府军的力量。当然，残兵败将们也曾一度影响到滇西边境一带的安宁。到了 1969 年，云南边境地区广泛开展了建设“政治边防”活动，意在防备帝修反的入侵，所以边民的防范意识和警惕性很高。

正是在这一历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小组在进入泸水县的测区后，立即赶到泸水县人民武装部，通报了战备测绘的工作方案和我们要去的地区，以便得到当地军民的支持和帮助。县武装部给我们开具了测绘工作证明书。武装部的部长在介绍边境情况时，讲到了中缅边界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县武装部有一个武装干事，正在我们即将要去的边界线一带搞“政治边防”工作，对那个地区的情况十分熟悉，我们如有需要帮助的问题，可以同武装干事取得联系。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我们把测绘工作的重点，很自然地摆在了边界线一带，也就引发了那一次遭遇“蒋残匪”的误会。

一天清晨，因为起床晚了，想到当天的路途遥远，我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带着两个 1971 年刚入伍的河北籍战士，从六库镇出发了，目的地当然是边界线附近的几个村寨。我们爬上比高（落差）三千多米的高黎贡山时已接近中午时分。想到离中缅边界线还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就马不停蹄地沿着山顶上弯弯曲曲的小路，向边界线赶去，想在太阳落山以前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没有想到，那两个

平原地区来的新兵蛋子，爬了半天山后，又累又饿早就走不动了，他们坚决要求休息，而且没得商量。其实，我也累得要命，干瘪的肚子早就唱起了空城计。三人坐在路边，每人一包压缩饼干下肚，根本解决不了饥饿的问题。按照以往的习惯“靠山吃山”，两位战友东瞧西望，想找野果充饥。一位战友发现不远处的山凹里有一棵野核桃树，树下坠落的刺核桃已自动炸开，露出硬壳核桃的本来面目。饥饿难忍，我们一哄而上围在树下，呼呼嘭嘭地砸而食之。石头把核桃砸得山响，略带苦味的野核桃仁终于填饱了肚皮。

想到当天的任务，我起身在前，顺着小山谷，一边四处打量地形地貌，一边低头在调绘夹板上勾画草图，标注地貌符号。刚走到山谷和山梁的交汇处，说时迟那时快，迎面杀气腾腾闯来了三个老百姓装束的人，为首一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掌将我推后一米多远，倒在战友的身上。他端起手中上好刺刀的步骑枪（步兵和骑兵通用的，枪身较短的步枪），如临大敌般地用刺刀指着我的胸膛，厉声呵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想起了县武装部部长说过的“蒋残匪”，于是惊出了一身冷汗。那两个新兵娃儿，仿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我做挡箭牌，在我身后也端起了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你们想干什么？”三个手持步骑枪的人见他俩凶暴暴的样子，往山坡上一指：“老实点，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抬头一看：山坡顶上无数支枪管正瞄准着我们。两个新兵一下子就泄了气，有气无力地端着冲锋枪，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神气。我心里想：“就是你俩个嘛，只顾填饱肚子，这下完都完了，让‘蒋残匪’包了饺子都不知道！”我心里怕是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大陆的地盘上，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总不能贪生怕死现“虾”像吧。僵持了好一会，怎么办？是哑巴不吃眼前亏，举手投降，还是拼死抵抗？我的汗水直冒，拿不定主意。没有想到的是，转机竟在一瞬之间出现了。

那个领头模样的人先做自我介绍：“我是泸水县武装部的武装干事，他们是这一带的基干民兵。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我如释负重地说：“原来是你！县武装部的部长说你在这里搞‘政治边防’工作。”

“是的嘛！”他接过证件看了又看，满脸笑容地说：“解放军同志对不起！误

会了。刚才，有一位在这里捡柴火的小姑娘，看见你们捡吃地上的核桃，还以为你们是偷越国界，冒充解放军的‘蒋残匪’……”

“哎呀！你不自报身份的话，我还以为你们是蒋残匪，把我们吓了好大一跳！”说到这里，大家都放声笑了起来。

纯朴好客的傣族汉子就是这样憨厚热情，一旦扫清心中的疑云，硬是生拉活扯，非要我们去他们的村寨里做客。没有办法，客随主便，只好同意忙完了当天的工作一定光临。

太阳落山了，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终于走进了那个边界线附近的傣族村寨。前来欢迎的村民们载歌载舞，村寨中的一块空地上已经燃起了一堆篝火。那时，边境地区的傣族人家，家境都十分贫寒。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们为了招待我们这些贵客，能倾其所有：民兵队长拿出了他珍藏多年，腌制的两只熊掌和其它野味，县武装部的武装干事，猎杀了一只傍晚到小溪边喝水的獐子（像小鹿一样的动物，头上没有角）。晚餐既简单又丰盛，有清香扑鼻的毛豆角熬制的玉米稀饭，火堆里炒出来的爆玉米花，水煮獐子肉拌干辣椒水，还有那腥气得令人作呕的腌熊掌。军民们边吃边唱边舞，大碗地喝着香甜可口的米酒和野果酒。一次遭遇“蒋残匪”的误会，演变成了边寨上军民鱼水情的篝火晚会。

片马丫口缅共游击队

我们小组的测区片马镇，位于泸水县城西部的中缅边境上。片马镇的南北西三面都与缅甸联邦共和国接壤，距缅甸的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本世纪之初，这里曾发生过边境各族人民英勇抵抗英帝国主义的“片马事件”，而且，至今仍保留着抵抗英军入侵的纪念碑。

为了加快测绘工作进度，我们从泸水县城向西去片马镇的途中，必须经过高黎贡山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碗口粗的山藤缠绕着参天的高大树木，奋力向上伸入云雾之中，树干和藤身上都布满了长丝条状的藓类植物，一丛一丛叫不出名称的蘑菇散布在腐枝败叶之中，松鼠在林间穿梭跳跃，悠扬的鸟鸣之声不绝于耳。低头寻觅路径，腐败的落叶把地面铺得蓬蓬松松，林间小路早已不见了踪影。迷路之中，我在地图上推算出我们所在的大概位置，

掏出指南针想辨别方向，正看得起劲，脚下一滑，摔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生命力顽强的矮灌木丛，凭借着丝丝缕缕的阳光，长得枝叶繁茂，把迷路的人横遮竖挡。穿行在其间，走不了多远，就感觉手背和脚杆上有异常情况。定眼一看：灌木丛的枝叶上爬满了翘首以待的干蚂蝗。这些不速之客闻到热血青年的气息，早已按捺不住，不请自到，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的鲜血。干蚂蝗一个个撑得大腹便便。我们急得用手把这些青灰色的入侵者拉得老长老长的，它们就是不肯松口。无可奈何中，有人想起了傣族老乡介绍的烟锅巴的作用，于是点燃一支香烟，又烤又烫才让这些低等动物松开了凶残的小嘴。把它们摔在地上，用脚使劲地踩踏，把自己被吸的鲜血都踩出来了，干蚂蝗仍然活蹦乱跳的，气得你吹胡子瞪眼睛，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闯入仙境，又遭遇干蚂蝗，惊慌失措良久才静下心来。在指南针的定位下，好不容易我们爬上近五百多米高的陡坡，才走出了原始森林。那一刻，登高望远，感觉天空太辽阔了。仔细看图，目的地片马丫口近在眼前。

片马丫口上有一个边防检查站，驻守着边防部队的一个排，附近的老乡都称他们为“丫口排”。听丫口排的战友说，我们来的山坡下的密林中还驻守着他们的边防连队，因为迷路我们没有看见。矗立在国界线边上的片马丫口，海拔高度四千多米。丫口上常年风雪交加，白雪皑皑，但是，也能在瞬息之间云开雾散，红日高照。我们天不亮就从泸水县城出发，区区三十多华里的路程，我们在原始森林中却走了六个多小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乘着丫口排为客人准备午餐的空闲，我们好奇地在丫口上东游西逛。那天，真是天遂人意，风和日丽。我们回首俯瞰不远处的怒江大峡谷，海潮般的云雾环绕群峰，升腾的峡谷风轻柔地舞弄着朵朵白云，变幻无常，千姿百态。站在冰雪覆盖的丫口上，向西展望，缅甸联邦共和国那边的崇山峻岭，同样是艳阳高照。见此情景，来自贵州省荔波县的布依族战士惊奇地发问：“崽哟！我们国家的太阳为什么跑到缅甸去了？”“啥子啵，我们国家的太阳？”我反问道。面对这样无知和滑稽的问题，我们只有一笑了之。

陪同我们的边防军战士指着山脚下的一条山谷说：“看，那里就是国界线，国界线那边正在农忙的就是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看着那些半军半农着装的人群，我关切地问：“听老乡说，缅共游击队里有不少队员是我们国家的知青，是吗？”两个边防军战友你一言我一语，把缅共游击队的情况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倾

泻出来。

原来，他们“丫口排”经常顺着西面的那条山路巡逻到山下的“下片马”（地名），那里才是真正的边防检查站。缅共游击队里的知青经常越过边界线，像回娘家一样同他们谈天说地，亲如兄弟。他们讲，老乡们说的一点不假，缅共游击队员中，确实有不少人是保山市腾冲县一带的回乡知青，也有从内地跑过去的知青。知青们作战非常勇敢，所以受到缅甸共产党的重用，提拔也很快，不少人已是排、连、营级干部。两个边防军战友还告诉我们，他们丫口排的战友们都见过缅共游击队的领导人德钦巴登顶。那是他应邀访问北京时，曾路过片马丫口，在丫口排休息过。他的随行警卫人员中，有几个就是我国的知青。这些当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而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的确让人敬佩！吃过午饭，组长带着两个战友去了“下片马”。我因为有别的任务不能一同前往，未能一睹缅共游击队里知青们的风采。

上网搜寻得知：1975年，德钦巴登顶当选为缅甸共产党主席，与缅甸联邦政府分庭抗礼在果敢及果敢以北的中缅边境地区。1989年，缅共游击队负责人之一的彭家声在果敢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与此同时，在缅共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也率部脱离缅甸共产党，投入彭家声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而八一五军区的多数高级领导人都是中国知青。众叛亲离的缅共德钦巴登顶主席，被林明贤礼送出境到了北京。1997年，德钦巴登顶在中国去世，享年83岁。

那个汉族人集居的缅甸果敢县，一直由彭家声领导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牢牢地控制着。缅甸共产党瓦解时，缅甸政府军想乘机收复果敢地区，曾派出二十多辆坦克准备进攻。当得知彭家声的同盟军有威力巨大的秘密武器（导弹）后，才怏怏作罢。也许是在中缅两国政府一致修好的大前提下，果敢的汉族同胞已逐步融入到缅甸的民族大家庭之中，成为缅甸的果敢民族。

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

继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后，1971年3至8月，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又掀起了“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支边活动，其

中，来自上海、重庆、昆明等城市的十万多知识青年，告别亲人和父母，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的边陲一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建设兵团。

就在支边青年到达云南边疆的那些日子，我们部队刚好完成了滇西的测绘任务，回到营区不久（1971年5月）就接到滇南测绘的新任务。部队从玉溪驻地顺老滇南公路南下，途经通海县、建水县、个旧市，在萝耗（地名）渡过红河（元江），翻越崇山峻岭，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就坐落在云岭山脉的半山腰上，我们小组的测区就分派在金平县的勐拉乡。因为任务紧迫，未敢在县城停留，于是从金平县城继续南下。随着海拔高度降低，气温逐渐升高。这条顺山谷通往勐拉乡的公路，坡陡路滑，公路两边生长着高大的木棉树，由于花期未过，木棉树上开满了橙红色的五瓣形花朵，花朵有拳头大小。

紧靠中越边界的勐拉坝子，是滇南群山中最大的一块平地，方圆有十六平方公里。被哀牢山脉紧紧环抱的坝子，其海拔高度只有一百多米，周围的群山都在海拔二千米以上。勐拉坝子因气候条件优越，可谓四季如春。从西北方向的山谷中流淌而出的藤条江把勐拉坝子一分为二。充足的水资源和亚热带气候，使这里的傣族村寨得天独厚：除一年收获两季水稻外，富饶的坝子还盛产橡胶、槟榔、木瓜、芒果、荔枝、甘蔗、胡椒、香蕉、菠萝等亚热带水果和经济作物。坝子周围的群山中，还散居着苗族、壮族、哈尼族、瑶族、苦聪族的村落。其中，较为原始的苦聪族当时不足一千人。

我们小组到达勐拉坝子，已是当年的5月中旬以后。当地的傣族同胞刚过完泼水节不久，坝子里似乎还残留着泼水节的余味。听乡里的干部介绍，泼水节来源于“佛出生时，龙喷香雨洗浴佛身”的传说。泼水节期间，傣族村寨都要举行法会，拜祭祖先，泼水狂欢。

云南边境上的各民族村民，把“赶场，赶集市”称为“赶街”。我们刚到不几天，就时逢赶街的日子。坝子周围的村村寨寨，男女老少蜂拥而至，集市上非常热闹。熙熙攘攘的少数民族同胞穿得五花八门，色调五彩缤纷。街道两边的山货和土特产应有尽有。人们时而围观，时而讨价还价。擦肩而过的傣族妇女，嘴里吧叽吧叽地嚼着槟榔，露出血盆大口和黑色的牙齿。上大下小的背篓上，拦腰系着一条背带，套在山寨妇女的额头上，她们把采购的货物，小猪崽和幼儿混装

在背篓中，有时会人哭猪叫闹成一团。

我们混杂在人群里采购生活物资。正在挑选山货和蔬菜，我的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兵哥哥同志，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我们重庆的人一样？”一个纯正的家乡口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扭头一看，一群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男女，正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得到确认后，这群重庆小崽儿欢呼雀跃，含着泪花用羡慕的口气说：“你好安逸哟！你是真正的解放军……”我从他们口无遮拦的叙说中得知：小老乡们是云南省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一连的支边青年，连队就在坝子里的不远处。他们是乘赶街的机会，到邮电局领取包裹的，包裹里装的全都是家里寄来的腊肉香肠之类的食品。老乡们越说越激动，直说得两眼泪流满面。在我的一再劝慰下，他们才止住了痛哭之声。

看着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一脸的委曲，心里酸溜溜的。我打起精神，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小组的住地做客。见了家乡的老大哥，的确用不着客气。吃饭的时候，我们有意少动筷子，一大锅油渣稀饭，一大盆青椒肉丝，被他们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

在一片感激声中，老乡们就说开了。原来他们是4月底才到达勐拉坝子的。来的时候，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员讲，这里四季如春（一点不假），四季水果不断，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参加建设兵团享受的是解放军的待遇。其实不然，连队的底子薄，伙食很差，每天两餐，油花米汤下饭。种植橡胶，每日上山下山，工作劳累，体力消耗很大，想吃肉都想疯了一样。所以不得不向父母求援，赶街的日子就是他们收获的日子，寄来的食品大家都共同分享。他们都说非常想念家乡重庆，但也懂得“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道理。他们强调，不管怎么说，支援边疆建设也是自己选择的路，再苦再累都要走下去，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

节日喜庆中听到惊人消息

顺利完成勐拉坝子的测绘任务后，已是1971年的国庆前夕，小组集结在边陲小县金平待命。金平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傣族自治州的南部地区，东隔红河（元江）与河口、屏边两县相望，南与越南莱州、黄边地区鸡犬之声相闻，北与个旧市为邻，西跨藤条江与绿春县接壤。金平县的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最

高的西隆山海拔三千零七十四米，最低的 龙脖河口海拔只有一百零五米，其地形多坡，山高谷深。气候条件优越，县境内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那时的金平苗族傣族自治县的县城十分简陋，多数是土墙房屋和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县城依山而建，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山城。金平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坐落在城西的最高处。县政府大院里的东边有一个篮球场，球场边一米多高的堡坎紧靠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这条公路向北可通往个旧市，向南直达本县的金水河镇。我们小组就借住在县政府篮球场旁边的一排平房里。篮球场旁边公路的对面有一条很陡的岔街直通下半城，与下半城的商业街构成“T”字形布局。等待验收闲着无聊，于是发挥我打篮球的特长，也是为了加强锻炼，每天下午和傍晚，我都要在篮球场上同县里的工作人员打几场坝坝球，以比试水平高低。他们见我打球十分卖力，猛冲猛打的，球友们就提醒我说：“解放军同志，小心嘞，如果把球摔过公路，顺着那条岔街道滚到下半城，匕（没）得半个小时找也找不着的嘛！”可以想象得到，县政府大院对整个县城来说，绝对是居高临下。如果你站在院里办公大楼的顶楼（四层楼）四处张望，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尽收眼底。

这里同云南的其它地方一样，每逢县城“赶街”的日子，小小的金平县城立刻就沸腾起来。天刚拂晓，四面八方通向县城的山路上，火把连着火把，从偏远的山区到城里“赶街”的少数民族同胞，可能是半夜就起身上路，赶街的人们结伴而行，长长的赶街队伍像一条条巨蟒在山间蠕动，火把同天际边的繁星连成一片，闪闪烁烁，星光灿烂。来到近处，恰是一队队舞动着黑旗、红旗，穿红戴绿的游行队伍。你看：苗族人家的妇女，似乎把全部家当都变成了白银首饰，挂在身上，走起路来浑身叮当乱响。我不认识那些发髻高束和顶着红色尖帽的妇女是什么民族，就跑去问那些球友，方才得知：县城附近的山区居住的全是苗族、瑶族同胞。令人称奇的是，同属一个民族，不同的分支，其妇女的头饰和装束则大不相同。就拿当地的瑶族来说，其分支就有：顶板瑶、红头瑶、花瑶等等分支。顶板瑶的少女成人以后，就必须用石蜡浇拌在头发上，然后在头顶的上方密封一块竖立着的小木牌，伴随其终生。红头瑶的少女成人后，则用石蜡封成一个高耸的发尖，发尖上裹一块红布，就像戴了一顶红色的尖尖帽一样。。我惊奇地问道：“她们这种头饰极不方便，而且时间一长也极不卫生，就不怕头上长虱子吗？”球友们笑着说：“不会的，她们每年都要用自己熬制的中草药水洗一次头发，封

蜡的时候也会在里面涂抹一些祖传秘方配制的中草药制剂。”

看着这些五彩缤纷的人群蜂拥而至，塞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人们大呼小叫，叫卖叫买地讨价还价，喧闹无比，人声鼎沸，那场景，就像召开各民族服装展示大会一样。

快要过国庆节了，县里下乡的干部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县城，增添了县委、县政府大院里节日的气氛。大院和街上，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最让我高兴的是，又增加了不少的新球友，篮球场上的聚会比平时更多了。为了活跃国庆节期间的文体生活，从9月底到10月初，县直机关处室和单位之间的篮球友谊比赛，每天下午都安排得满满的（那时还没有灯光球场）。我毛遂自荐地担当起了篮球友谊比赛的裁判工作。

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篮球比赛中途休息，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急急忙忙地走到县委书记的面前，小声地嘀咕了几句，两人就回办公大楼去了。比赛刚结束，县委办公室的秘书就通知所有的县直机关干部到县委会议室开会。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饭以后，我们也没有在意，未曾想到，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

第二天上午，组长接到中队部的电话通知，让我们到金平县委办公室去借阅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叛国外逃的机密文件（中发〈1971〉第57号文件的传真件）。组长手里拿着电话听筒，惊得合不拢嘴，老半天才告诉我实情。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告诉我们，该文件暂时只能传达到县、镇一级和军内，他们只有传真件，我们只能在县委会议室里传达，文件不能带走。大家尖起耳朵，怦怦心跳地听完文件。

不愿做枪下的孤魂野鬼

“不愿做枪下的孤魂野鬼”，这是我在部队服兵役期间，遇事不顺心，思念亲人，想退伍回家乡重庆，因不能遂愿，忧郁之中差点开枪自杀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68年初我应征入伍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正猛烈地席卷着全国的城市、乡村，甚至是每一个角落，自然而然地也会冲击到我所服兵役的测绘大队。那时

的部队同地方一样，不管你的官有多大，资历有多深，只要捕风捉影地发现你有问题，特别是历史问题，就会通知你去参加军区举办的“学习班”，轻者挨批斗，重者被打倒，还要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测绘大队的老政委，曾参加过山西抗日决死队，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负过重伤，立过战功，他的结发妻子和儿子，在抗日战争中都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残酷地杀害了。这个身高一米八的老革命，在接到参加军区学习班的通知后，郁闷了一天，第二天就发现他自杀在部队后面的青龙山脚下，临死前他佩戴了珍藏多年的军功章。

大队作训股的一个参谋，听说是被解放军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测绘技术员，在接到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后，惊恐万分，借口收拾行李，就自杀在家中。

凡是自杀的人，无一例外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株连到家属和子女。正因为要株连到家庭，后来我才没有迈出不可挽回的那一步。

我是1964年进校的“老三届”高中生，在当时的部队也算得上是有学历，有文化的战士。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个人表现也比较突出，入伍不到两年时间，就被中队党支部拟定为入党发展对象，其目的当然是想让我留在部队。那时部队提拔干部最重要的条件：一是要看成分，二是要看党票。至于业务技能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在首要的条件之中。中队党支部派人找我谈话时，我明确地表达了不愿留在部队的意见，一同入伍的校友和我的想法一致，都想早点回到家乡重庆。当时部队的情况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兵愿意留下来，中队不想留，却缠着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学生兵不放，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更坚定了我退伍的决心，而且表露在外。在此情况下，有人打我的小报告，说我到处散布“离队”思想，为此，我遭到了中队长的严厉批评和教育。我虽然坚持己见，最后还是在中队部许下的我入党提干后立即到武汉测绘学院进修的诺言中败下阵来，没办法，不然的话，五年之内中队决不放我走。出于无奈，也是为了获得大专学历，我写了入党申请书。

人不顺心，喝口凉水都要塞牙。半年后中队党支部委员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在召开党支部大会审议前，马拉松式的政治审查就开始了。一个月以后，到重庆外调的人回部队说，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夕（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参加过

国民党。中队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当然不知情。我立即又提出了退伍的请求，得到的答复仍然是：要等待地方做结论，要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就这样，政审工作一拖就是两年。一同入伍提干的战友，到武汉测绘学院学习后又回到了部队。想到我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处境，心里开始郁闷起来。

1972年的初冬，我正在云南省新平县的哀牢山上进行“收测”（完成任务前）前的扫尾工作。中队指导员到我们小组检查验收地图的修测情况时，专门找我谈话，他如释重负地说：“你的政审过关了。你父亲是集体加入的国民党，这种情况在解放前夕很普遍，你父亲在他的个人档案中对组织有过交待，另外，你的大弟弟在1971年初就入党了，为什么不向中队党支部汇报这个情况？”我沉默不语了很久，然后就爆发了，我说：“感谢组织的关怀，澄清了事实，让我修得了正果！叫我汇报情况，我说想退伍，你们听了么？我还有汇报的必要么？大队政治处每年都要派人到重庆外调两次，用得着我个人申诉么？”我接二连三的几个反问，把指导员说得面红耳赤，他老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乘他还傻在那里，我又一次提出了退伍的要求。没想到他仍然态度坚决地说：“你入党提干的问题，是几天前中队党支部委员会才讨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否定，希望你正确对待。”“我正确对待的时间难道还短了么？”我又一次提出反问。双方情绪都激动起来，谈话不欢而散。

部队在收测前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测绘的专业术语叫“接图”。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相互临近的两个测绘小组，约定好时间，到双方地图的共同边界进行实地交接，以便统一边界线上的村庄、道路、桥梁的等级，通讯线路的进出位置，以及“植被”（针、阔叶林，灌木、草地等等）的符号，以免双方出现误差，在收测后返工。

约定接图的那一天上午，哀牢山上阳光明媚，由于哀牢山的冬季不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阳光下和树荫处的温差也不算小，这是空气干燥地区的气温特点。所以云南人在冬季穿棉衣棉裤烤太阳是一种享受。接图的路上，我和小组长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走起路来显得步履维艰。赶到接图地点，友邻小组已先到一步。经过仔细对照，双方所画的地图在边界上几乎没有差别，接图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般都有一些小改动）。我曾经参与过一次糟糕的

接图工作，由于双方所绘地图的边界差距较大，为了各自的脸面争辩得互不相让，最后不得已让中队领导出面来做裁判，事情才得以了断。所以，如此顺利的接图工作还比较少见，两个小组长非常高兴，这说明他俩绘图的水平一致。为了庆贺，他们选择了一个路边的么店子（小饭馆）共进午餐，大家都多喝了点烧酒。

吃过午饭返回小组住地已是下午3点多钟。听乡里的干部说，他们乡刚刚退伍的老兵想和我们测绘小组打一场篮球友谊比赛，我们没有半点犹豫就上阵了。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的失误：在身体十分疲惫的情况下，进行剧烈的运动，是极不明智的选择，事后又不注意冷热，最终酿成了大错。同山里长大的人打篮球，他们球技不高却有用不完的蛮力气，一个个跑得飞叉叉的，横冲直撞。我们全组六个人轮流上场，有两个战友不会打篮球，连球都接不稳，我们被撞得人仰马翻，比赛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输得瓜兮兮的，累得我汗流浹背不说，心里是一肚子的气。回到住地饭也不想吃，倒在床上连铺盖都忘了盖就睡着了。一股寒气袭来，我从梦中惊醒，打了几个冷战，恶运就这样开始了。

次日早晨醒来，感觉头重脚轻，身体不适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到乡卫生院打针吃药按感冒处置了事。随后的几天低烧不退。为了发汗，我提议全组上山打柴火，艰难地走到一座小山上，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让那个贵州荔波县的战友帮我砍了一捆柴火，绑成“A”字形架在肩上。回去的路，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绝壁，我扛着柴火跌跌撞撞，几次都差点摔下沟去，最后赌气把柴火丢进山沟里才算了事。回到乡里直接去了卫生院，医生说我的眼白已出现了“黄疸”，他问了一下生病前的情况，分析说：云南的秋冬两季是急性黄疸性肝炎传染的爆发期，让我赶快去大医院检查化验才能确诊，以免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组长立即把我生病的情况汇报给了中队部。应该说中队部是很重视的，决定第二天派车上山，然后送我回玉溪专区医院检查。但是我想到了入伍几年来的坎坷经历，越想越气，心里难以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当晚是一个难以入睡的不眠之夜。已是夜深人静之时，我靠墙坐在紧闭的蚊帐里，听到战友们的酣睡之声，不顺心的往事像过电影一般，一幕又一幕地展现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思前想后，我难以面对暗淡的前景，决定逃避现实。我坚定地从小头底下摸出了那一把跟随我多年的手枪，我知道枪膛里早已上好了顶膛的子弹，我迅速地用大拇指拉开了撞针，把枪口对准了右边的太阳穴，定了定

神，想一下还有什么需要交待的事，也好记录在遗书上。这时，我首先想起了生我养育我的父母亲，同时也想起了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最终自杀身亡被定性为“反革命”的老政委，我犹豫了：只要枪一响，我是一了百了，但是“反革命”的帽子扣在头上肯定会影响到我的家人！想到这里我潜然泪下。那一夜我始终在鬼门关前徘徊、彷徨，不停地举起枪又放下枪，不停地流泪，泪水湿透了衣衫。

天已经亮了，睡在我旁边的小组长被我的抽泣声惊醒，他轻轻地撩开我的蚊帐，看见我手里握着手枪，吓了一跳。他按住手枪，轻言细语地说：“老杜，别想不开，你不是想回重庆嘛，这一回你肯定如愿了！别犯傻，千万别当了枪下的孤魂野鬼。”

旁观者清，他不轻不重的两句话指点了迷津，驱散了我心中的愁云，我感激地点了点头。是呀！我不是想回重庆嘛？生此重病部队还会留我吗？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好险啦！庆幸之中，我的心在呐喊：“我要回家乡，决不做枪下的孤魂野鬼！”

摘自作者军旅生活回忆录，原文七万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忆旧思亲】

宁波姑娘甬囡

王炼利

甬囡，是一个出生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普通宁波女人的名字。我认识她，大约在1974年前后，她在我们船厂宿舍住了一个多星期，与我同一间房。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我会经常想起她，我是欠了她情的。

认识甬囡，是因为她的舅舅，她是来看她的舅舅，才住进了我们宿舍。

我与甬囡的舅舅不陌生，我1968年冬进厂，就与甬囡的舅舅在同一个车间干活，我操作的车床距离甬囡的舅舅操作的立式车床才十几步路，但我与甬囡的舅舅从未说过一句话，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甬囡的舅舅是右派，是阶级敌人。我刚进厂，我师傅就指着近在咫尺的他告诉我：“他是交通大学毕业的，是个‘小右派’。”在船厂，“小右派”替代了他的真名。我们这些刚分配进厂的小青年才从学校的阶级斗争战场转移到工厂的阶级斗争战场，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是体现我们具备了革命立场。

“小右派”本身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中等个子，五官还算端正，但皮肤黝黑，算得上是黄种人里的“黑人”，肤色黑不是丑陋，但不能没有精气神，偏偏他一点精气神都没有，黑肤色更添了邋遢相。他头发又浓密，又不剪短，这就像乱蓬草长在了脑壳上，旁人看了都头皮发痒；一副黑色宽方框眼镜架上他鼻梁，使脸还黑出了层次，面孔则总给人洗不干净的感觉；他老是穿一条脏得油亮的工装裤，走过他身边，就闻得到一股浓浓的机油味。如果光这样也就算了，不过就是个很邋遢的“小右派”，让我更不能接受的是“小右派”丑闻不断——他在公交车上屡次对异性实施“性骚扰”，作为年轻女性，对此人反感厌恶就很自然正常。

有一天，我到底还是正面面对了“小右派”，他带着他的外甥女来到了我们二楼女宿舍，未开言先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笑脸，像在给我们陪不是：“啊……这……啊……是我的外甥女，麻烦……麻烦你们了……”刚说到“麻烦”两字，他边朝我们点头边往后退，几步就退到楼梯口，一个180度转身，自顾自快步跑下了楼梯，也不多叮咛外甥女一下。就这样，留下了甬囡。

甬囡与她舅舅简直是一天一地。小姑娘比我略小几岁，浓眉大眼，头发梳得光洁，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腰际，身材丰满匀称，洋溢着青春气息。虽然年龄不大，却显得成熟干练。我和室友也都才20岁刚出头，年轻姑娘在一块儿，本身就很容易“自来熟”，我们很真诚地接纳了她，忘了她有这么个提不起的舅舅。

我们很快就聊熟了。我籍贯宁波，与甬囡用宁波话交谈，很是亲切。聊呀聊的，免不了要提起她舅舅。“我们全家都清清白白的，就是他做了右派，我妈就为这事难受。”甬囡重重叹了口气。她说她舅舅是“做了右派”，好像右派是种可以选择的职业，我听了感到好笑。但我理解甬囡她妈的心情，宁波女人对娘家兄弟的感情特重，不逊于对自己的老公儿女。碍于甬囡的情面，我也陪她轻叹了口气。

关于“小右派”屡次在公交车上性骚扰被扭送到派出所之事，甬囡竟然都知道。不到 20 岁的姑娘谈到此事有些愤愤然：“我说，你们厂里也不好，你让他成了家不就没有事了？他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都快谈成了，你们厂里对女方说，他是右派，要人家好好考虑后果，结果就这样吹了。右派怎么了？他不偷不抢的，不过讲了些错话，讲错了，以后不讲就是了，为啥要弄到他连个家都成不了？”

甬囡这番话让我听得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有像甬囡这样思考过！我也没有听到厂里的年轻人有这样说话这样思考的——我们不会像甬囡这样从人性常识出发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多年的革命教育告诉我们，右派，就是阶级敌人，他自己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就不是“讲错了就不讲”那么简单的问题了。他是右派，组织上当然是要告诉女方，那是组织上对女方负责呀！右派，是要与之划清界限的人，右派与普通人结婚，不是害人家吗？面对甬囡的愤懑，我当时心里面是这么反应的。

谢天谢地，我还没有不可救药到把这些话当着甬囡的面说出来，我是和她“今天天气哈哈”地把话头岔开了。我想，“小右派”是她舅舅，她向着她舅舅也正常，那年头，虽然风行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但甬囡并不认为她舅舅是阶级敌人，怎么可能划清界限？她政治上那么幼稚，就那样的认识水平和觉悟，与她较什么真？况且，甬囡与我们谈别的事情都谈得很投缘，我不愿意与甬囡发生什么不愉快。

在甬囡临行前一个晚上，我俩是睡在一个被窝里的，说些什么都忘记了，但甬囡热腾腾的身子暖着四肢冰凉的我，住了多年单人宿舍，我还没有睡得这么暖和过。那时可还没有发明电热毯！

甬囡走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有人敲宿舍房门，我打开门，一下就僵住了，门外站的是“小右派”！他手提一个布包袱，神情比我们更紧张。他仿佛急于解释和表白：“我外甥女让我带点土产给你们……这都是我外甥女的意思，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这不是我的意思……”同室室友接过包袱，说：“知道了，你代我们谢谢她。”“噢，谢谢你们，谢谢！”

也不知道“小右派”是谢我们接纳了甬囡，还是谢我们收下了包袱，反正他是如释重负，转身快步走了。

甬囡带给我们的是当时十分稀罕的炒花生！还附了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我

早已忘记，但信后的署名我至今记得：“宁波朋友 甬囡”。

我和室友吃着花生。花生好香，好香。

室友对我说：“我们写封回信吧，谢谢她。”我却不置可否。

吃了人家的，说声谢谢，怎么也应该的，何况我们还处得不错！但是，她有这么个“阶级敌人”的舅舅！她可以因为是亲舅舅而不划清界限，而我们本来与她舅舅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就此与甬囡来往、哪怕是通信来往，以后也难逃不与“小右派”没有瓜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年代，没事找事找个阶级敌人的亲属去来往，不仅是吃饱了撑的，更是在自找棺材睡！哪一天被人揭发——那年代被人揭发和揭发别人是常态，要你交代为什么突然会与阶级敌人的家属有往来、目的是什么、动机又是什么、自己因此受了阶级敌人哪些影响、是否觉察到阶级敌人的家属（背后就是阶级敌人）有着拖年青人下水的企图……等等等等，经历了文革的我熟悉这些简直是“如数家珍”，万一有这么的一天，那可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唉！谁让她有这么个舅舅！

“花生真香！”我说。

“那你写回信吧？”写信这类事好像该我承包似的。

但我坚定地回绝：“不！”

室友也就不坚持了。

可我在心里说：“甬囡，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地道。我负了甬囡，负了一个朋友。

八十年代初，右派“改正”，“小右派”也不例外。“改正”以后，四十好几的他与一位教师结了婚。因为“小右派”已经不是右派了，我也没有了顾忌，一天主动向他问起甬囡的情况，他眉开眼笑地回我：“她呀，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儿子！”

啊，我为甬囡祝福！

顺便端详了一眼“小右派”，以前的猥琐样消失了。他已调到了科室工作，工装裤不再穿了，一身黑灰布夹克挺合身。当然，衣服不会再泛油亮了，但面孔有了光亮，原先的黑宽框眼镜换了副窄边框的，眼睛有了神，少量的白发已经上了头，倒给黑皮肤的他添了点亮色，皱纹却没有。他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他

刚有了儿子！啊，八十年代的他与当年的“小右派”已经判若两人。

甬囡她妈该放心了。

算来甬囡现在也有五十多岁了，她该当“阿娘”（宁波话，指奶奶）了吧？我真的很想她。

甬囡其实很有见识，有着普通人的见识。而当年自以为是的我，缺的正是普通人的见识。因为“要求进步”、不做组织上不希望发生的事已经成了我的潜意识，而甬囡没有一丝这样的念头。她说过一句与她年龄似乎不相称的话：“阿拉是老百姓，好好过‘太平日脚’（太平日子）就够了。”

我不如甬囡。

甬囡，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2008.8.22

【简讯】

两本红卫兵运动的口述回忆出版

卜伟华

由“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口述历史之二）今年3月在香港由中国书局有限公司出版。

两本书共收录了18个红卫兵运动亲历者或见证、研究者的口述回忆，他们是：卜大华、秦晓、李冬民、王宇、侯瑛、伊林、涤西、谭力夫、蒯大富、陈小鲁、刘龙江、叶维丽、贺延光、章立凡、李大同、老鬼、傅红、任志强。其中有的是当年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有的是见证了红卫兵运动并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的学者。

两本书共842页，定价一共港币120元/台币450元。

据编者介绍，他们以后还将采访更多的亲历者，并编辑出版他们的口述回忆。

【简讯】

《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出版

梁志福

由蔡文彬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2011年4月在香港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鲍彤、吴国光分别作序和导言。

文革后期，赵紫阳受命来到当时人口最多、文革前期大规模武斗为全国之冠、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四川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上任之初，他即实事求是，深入基层，虚心倾听各种意见，绝不整人，对于在文革中积累起的种种矛盾，总是力图避免“非我即敌”的阶级斗争思维，而是人性、宽厚地通过协商对话、说服让步、软化矛盾，妥善解决各种遗留问题，从而稳定了大局，赢得了民心。同时，赵紫阳在文革后不失时机地领导四川上亿人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先河，并为他任国务院总理后在全国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从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1月22日的146天时间里，本书主编先后联系并拜访了177位在1975年至1980年间在四川与赵紫阳有过较多接触的相关人士，年龄最小的64岁，最大的97岁，本书从中选出五十余位当年在省、地、县级党政机关工作的老干部的回忆，还有文革群众组织的代表蔡文彬（文革中的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时任省革委副主任、共青团省委书记）、杨志诚（文革中的造反派工人组织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时任省革委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陈述泉（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等人的回忆。本书由事件亲历者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赵紫阳1975年至1980年主政四川期间，和四川干部、群众一道，为突破高度集中、高度僵化的政经体制，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行富民兴川而进行的伟大探索。对文革研究者来说，本书所涉及的文革最后一年因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人为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文革后完全按照文革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揭、批、查”大整造反派的情况，都提供了许多真实、生动的史料。

【简讯】

《找寻真实的林彪》出版

华 铭

2011年7月中旬，有关林彪研究的最新成果——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着重探讨了1949年以来直至“九一三事件”的林彪。该书分为上下两编，共665页，约60万字。上编主要探讨了林彪与朝鲜战争、林彪与高饶事件、1958年的解放军高层反教条主义事件与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与林彪、1962年七千人大会与林彪、林彪与解放军的建设与发展，以及林彪与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下编着重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林彪，主要涉及了林彪与罗瑞卿事件、1966年初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从“五一八讲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之初林彪对军队的稳定、文革前期林彪与错综复杂的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1968年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到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党内高层的恩怨与林彪、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庐山会议后中共政局的演变、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作者在最后结束语部分重点讨论了为林彪翻案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林彪与江青等人斗争的性质问题、林彪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责任问题，以及林彪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林彪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活动作了全新的辨析。

【编读往来】

1、庄菁瑞谈《清华蒯大富》作者自序的局限性：

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的自序中说：“关于毛泽东是非功罪的争论三千年后还会继续。但毛泽东主张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性让反对他的人永远打不倒他。毛泽东主张人民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严格监督当权者并全方位地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是伟大的历史巨人。”

许先生以毛的言代替了行。在他看来，毛说的就是毛做的。作为文革的亲历者，许先生居然把造成数百万人惨死，数千万人蒙冤，上亿人受牵连的浩劫视为毛主张人民拥有民主权利，监督当权者的壮举。这种说法，即使“乌有之乡”中的高人，恐怕也会自叹弗如。

许爱晶的奇思高论还远不止于此。在这个自序中，许先生还对毛的教育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关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毛泽东是坚持自己在教育战线的政治主张和办学方向。因为清华最能代表中国教育的方向，也最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要看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毛泽东逝世，迟群照样落得被判刑的结局。从全局看，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包括在教育战线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应当另作他论。早在1964年春节毛泽东谈话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许先生由此发出了批判现实的感叹：“1964年到2011年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教育改革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来越糟糕。目前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都存在严重弊病。”

许爱晶的上述言论说明了怀旧者，尤其是造反派们的思想混乱——因为憎恨当前的教育腐败，而把毛的教育思想当作法宝。事实上，文革中的教育实践已经否定了毛的那一套教育思想。

2、黄葛云谈《清华蒯大富》作者的自序：

读到上期转载的“爱晶”先生为《清华蒯大富》所作的自序，感慨万端。想不到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爱晶”先生的思想还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开口闭口还是

毛时代所灌输的那些不讲法治、不讲公民权利的专制观念。不是把每个人看成有同样权利、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而是仍然使用毛最爱用来糊弄人的“绝大多数”这个概念。

比如他说：“法律本身要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公民中可以分出“绝大多数”吗？那么在“绝大多数”之外的少数公民的权利就不要维护了吗？他又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绝大多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那么，请问在这“绝大多数”之外的少数公民或个别公民是不是就不配享有这个“民主”了？

当年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模糊概念来糊弄人的。他老把自己打扮成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等等。他反对的、打击的都只是“一小撮”。然而随着他那些不断折腾、不断深入的政治运动，“一小撮”的范围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许多原来属于“绝大多数”中的人们接二连三地被揪出来，抛进了“一小撮”里。

更重要的是，他划分“绝大多数”和“一小撮”的标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换言之，是按照他个人的政治需要随时变化的。今天可以说你属于“绝大多数”，明天则可以因为你同样的言行而说你属于“一小撮”——就拿“爱晶”先生们来说吧，今天需要你的时候可以说你是“革命小将”，“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明天不需要你了则可以因为你那些同样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言行而说你是“五一六”，或者是“反革命帮派体系”。按照“爱晶”先生的这个“绝大多数”的逻辑，他们当年挨整被关被判刑，岂不是活该？

3、南阳谈顾土的《科技与文革》：

上期顾士文章说，对毛的个人迷信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大意，可能不准确），分别是原子弹爆炸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过来人，我觉得不大准确。居然对“林副统帅”的“功绩”只字不提——那个学雷锋运动（其中雷锋学毛著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运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大学毛著运动，各地、各单位评比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活动……好像都让位于“原子弹爆炸”和音乐剧《东方红》了？有些事情对推动毛个人崇拜起的作用更大，我想过来人心里都有数吧？

4、赵正谈王行国日记：

读了王行国老师 1966 年的《日记》，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王老师用他身受的苦难，为中国最好的中学——男四中留下了沉重的一页。我相信，他的文字，不但对四中人，对北京中学界，甚至会对红卫兵运动史都有重要的价值。王老师用他的笔告诉我：历史并不总是胜利者写的。

5、翁汇文称赞王行国三文：

文革中我曾在北京中学任教，现已年过八旬，正在撰写个人的回忆录。可是年岁大了，好多事都记不清了，有的问题我也无法判断。今年初，在大学读书的孙女给我打印了贵刊。我看到了《记忆》第 66、67、68、70 和 72 期。它们让我回想起好多事。尤其是 72 期，使我想起了文革中我在中学当教师时的好多细节。如果方便的话，请您们代我向王行国老师致敬。他的文章和日记让我久久地感动。我从中看到了历史的真实，看到了做人的勇气。

6、叶维丽谈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

四中文革专辑（二）让不同观点的人出来说话，“历史真相”在记忆的碰撞中才能逐步清晰起来，否则不是这一面被“屏蔽”，就是那一面被屏蔽，东拼西凑才能织出“历史”的“百衲衣”。《记忆》能提供这样“七嘴八舌”的平台真是很好。可惜世人一般不大喜欢“百衲衣”，“史家”也往往有观点先行的问题。但“真相”哪里像小葱拌豆腐那样清爽。